

專題報導：轉型正義



2022

NO. 30 DEC.

城鄉通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自由廣場 攝影 | 陳泓羽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照片 陳泓羽

美術編輯 榮嘉蕾

文字編輯 林佳蓓 / 秦沐涵 / 陳泓羽

雜誌投稿 ntubpnews@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2023 年伊始，城鄉通訊編輯室在這裡祝各位同學師長新春快樂。

本期《城鄉通訊》作為 2022 年冬季號，為大家帶來「轉型正義」專題。相信大家對於這一議題的關注度頗高，尤其是在社會進行民主轉型後，對於過去威權時期一些不可言說的政治壓迫。說起「轉型正義」，我們也不得不提到中正紀念堂的地景，也因此此次的封面我們選擇了中正紀念堂的一隅，此地作為轉型正義中最顯眼的案例。我們也邀請到黃舒楣老師透過她的視角來談談「轉型正義」的不同看法。

教職員訪談的部分我們邀請到了林家暉老師和曾擔任所辦工作的楊竣宇與我們進行分享最近的研究與生活。林家暉老師在後殖民和博物館的專業領域上都有所成就，在訪談的過程中，老師同樣也與我們分享了如何從一名專業的建築設計者轉型成為理論研究者，相信這樣的經歷也能為許多建築專業背景的同學們解惑。楊竣宇在所辦工作期間擔任行政助理一職，相信很多同學都與學長有過接觸，此次邀約也希望可以與同學們分享在城鄉所學習的經驗，此次訪談也是希望藉由過來人的身份與同學們通過文字對話。

校友訪談我們訪談到了林偉、洪秉澤以及潘信榮。林偉作為建築系出身，在城鄉所看到了更多建築的可能性，難民營的社區營造工作實踐經驗也讓學長有了更多的思考。洪秉澤曾作為「南機拌飯」的一員與我們分享了他的一些工作經歷，如何在社造團隊中更好地與集體協作學長也有著自己的見解。潘信榮作為玖樓的創辦人之一，與我們分享了他的一些合作住宅的團隊經驗，作為有想法的年輕人代表，學長又是如何將想法積極實踐的？在訪談中我們得以一一了解。

「城鄉放送局專欄」本期邀請到王昱鈞來進行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關於「做好自己」、「對自己有利」、「對自己有意義」正是他想要告訴我們的。最後城鄉評論的部分感謝陳品嘉與鍾智豪兩位同學的投稿，對不義遺址與空間修補感興趣的讀者可以一一細讀。

春夏秋冬即是一年的輪迴，也是全新的開始，望此期冬季刊能夠通過文字的力量讓你感受到冬去春來，社會的轉型仍在繼續，也望轉型正義可以迎來春天。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2.12

目錄

編輯室報告 001

專題報導 003

黃舒楣：「轉型正義」

教職員動態 008
018

林家暉：後殖民是一種觀點

楊竣宇：掌控自己的生活

校友迴流 024

林偉：穿梭在全球與地方之間的實踐者

032 洪秉澤：合作社的那些事

040 潘信榮：玖樓——共生居住空間

城鄉放送局 050

王昱鈞：在校園與社會實踐中重新定義「利己主義」

城鄉評論 060

陳品嘉：得來不「義」

066 鍾智豪：全球化下中國空間修補方式的轉變



何為「轉型正義」？

◎ 訪談整理 秦沐涵

與其說「轉型正義」是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所做的善後工作，不如說「轉型正義」通常在處理的是還沒有完全結束的、在國家運作的很多層面上面仍然有影響有遺緒的事物，而善後比較像是已經結束後的處理。

這裡舉兩個例子，其一就是中正紀念堂的地景，它作為國家的一個紀念地景，一直到今天有特別的條例、預算和人員編制在管理維護它，基本上還沒有辦法去反應促轉的想法。這個議題很複雜，但這是一個很清楚例子能讓你看到其實這是一個很多東西都還沒有結束的狀態。

另外一個例子不是直接與空間有關，但也是轉型正義裡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有很多人在威權統治期間，因為戒嚴時候不充分的司法判處過程，被認為有叛亂的嫌疑而被定罪。一直到近幾年國家才開始去處理除罪的問題。這裡還包括了已經過世的受刑人，為他們正式去除罪名。其實對於很多當事人以及他們的家人來說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為能夠正式從國家手中拿到一張公告撤銷及前科紀錄塗銷作業。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其實很難想像自己的檔案記錄上面有罪那是什麼意思。有無前科會影響一個人非常多的層面，那些戒嚴時期被定罪的人原本可能是在各領域都可以很突出的人才，但因為入罪而無法再繼續下去，同時那個年代也影響到了他的家人與兒女。這所謂的歷史傷痕並非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其實轉型正義也在處理這個部分。戒嚴時期實在是太長了，長到深入了很多層面。社會大部分人對這件事情習以為常到不會去質疑，一直到這十年來才開始陸續出現一些討論與調整，開始思考為什麼校園裡會有教官、為什麼有特定的領導人物的銅像等等。

過去四年間我陸續有參與些在協助促轉會處理不義遺址和威權象徵相關的工作，參加過一些顧問會議。威權象徵、不義遺址是在促轉條例中有的兩個概念，是比較不一樣的。「不義遺址」特別談的是威權時期國家的司法的工具，系統性大規模地進行不當的暴力施加於人民，與這些過程有關的地點就被稱為





▲作者近照
攝影 | 黃舒楣

「不義遺址」。這些遺址不同規模不同類型散佈在全台灣，例如現在被改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的景美，它曾經是一個白色恐怖時期的監獄，而與這些不義遺址相關聯的是人們所經歷的不當的逮捕、拘禁、審訊與處分，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不同的階段，涉及到在不同特定地點的發生。這一系列的不義遺址中涉及的很多地方，在今天並不那麼容易辨識出來，一來不當暴力往往發生在一些城市邊緣例如河岸，因為行為活動的屬性就採取了一些偏僻邊緣的地方，刻意迴避了大眾的關注；再來威權統治時期結束的幾十年來持續有很多改動，所以很多不義遺址現在來看，可能會在特定的中學校園內，甚至會是民宅廂房、廟宇廂房。存在於那些電影或文學裡的秘密監禁的地方。學校空間在當時非常有挪用的潛力，因為對象也很多是針對學校裡的老師和學生，認為其有左翼思想；還有好些空間的挪用，並不是在那些原來就設計好要進行這些活動的地方，但它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會受到挪用。

以民間的觀點來看，整個恐懼是從1947年的二二八到1950-80年代的白色恐怖所累積起來的。二二八有非常多過程完全不透明的案件，很多菁英、畫家、醫生突然就丟了性命，這在當時是完全沒有解釋的。到了白色恐怖的時候做法不同，某程度來說帶來的影響更長遠幽微，當時的政府都設想這些人在招募共產黨員，認為他們串聯集結會危害國家安全。當時沒有很清楚地懷疑對象，希望把一整串種子都抓出來，民間不太理解但明白這是會牽連入罪的，人人都有恐懼的記憶但不敢多問多說。恐懼和沈默甚至會發生在很多政治犯的家庭中。例如近期在我的課堂上才聽到有同學回顧家族裡面有叔公是二二八的受害者，但家族中是不會提到這件事情的，直到近年風氣開放，很多年輕人會想要去追問才開始慢慢地談論到這些事情。

不義遺址轉型對社會的意義

我們對於這段歷史才開始要好好理解，需要從法律、歷史等各種層面來理解。一個城鄉地景持續變化的過程裡面我們需要去挪用、佔用、使用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裡會發生塗抹、改寫、替代，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情。並不是說一定要所有東西都凍結式保存下來。當面對不義遺址相關的特定地景曾經見證了很重要但是持續受到忽略的歷史，就深化對於過去的理解。本身來說公眾教育是件很重要的事情。這都還沒有涉及到我們要把它們轉化做成觀光旅遊或者展示空間，現在談這些都還太快了，但我們至少需要知道曾經在哪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以校園裡的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來說，這是一個離我們很近也比較容易理解的例子。在那之前，學生經過或逗留那裡也不知道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也不太有機會被提醒原來校園裡有離我們這麼近的地方曾經有過這樣的事件。不義遺址以它為例可以比較深刻地來理解，以陳文成事件廣場來說會有點像是空間中的一個書籤，去提醒大家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情。很多的紀念空間建置其實背後是有期許的，用英文來說是「never again」，也就是不希望再發生類似事情。不過記憶是更複雜的…對於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來說，它的解說牌是有所爭議的，究竟要叫做「陳文成博士紀念廣場」還是「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這兩者是有其不同的意義。學校一度想要以名字來命名廣場，以紀念校友的名義試圖淡化命案，總之，關於定位上倡議人與校方角力了許多。¹

再者以新店的安康接待室為例，它其實是一個秘密審訊和監禁的空間。這個空間是調查局所管理，生活在這附近的人也未必很清楚地知道這裡面是什麼，這是刻意而為的。像這樣的地方未來要如何處理與討論？每一個這樣的案例都有其特殊性，必須考慮到具體的空間特性，每個個案都有不同的討論。例如學校裡也有爭議，「是否要和政治保持距離」還是這應該是教育中的一環？對於安康接待室也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去切入，把它指認出來後下一步究竟要如何去做。

有些不義遺址位於民宅，曾有部分的廂房被借用，乃至於有「天牢」之暱稱，有很多遭到秘密監禁審訊的人在被抓捕的過程中都不知道自己被帶到了哪裡，整個過程都是秘密不透明的。家族部分政府和當時政府關係親近，但同一家族裡的一些成員對於這裡究竟監禁了誰可能也未知。這類案例的後續處理有一些獨特的難題，畢竟屬於家族私有財產，後代如何看待打開空間去銜接展示、教育，不宜以唯一的專業見解來決定要怎麼做。

不義遺址散佈全台灣各地，類型也各不相同。威權時期這段歷史很重要，其不應該是特定個人的創傷由私人來承受，而應該是社會集體的認識和反省，按照這個思路來說，會希

¹ 本所洪苡寧有相關碩士論文完稿中，未來可供參考。

望其有一定程度的指認並且銜接到教育程度的推廣，成為可以參訪學習的空間。但這也要面臨到一個問題，可能會與後續挪用的空間功能是衝突的，所以並沒有標準的答案可以去操作這些空間，表達不當則會變成另外一種很暴力的過程。這會有一個辯論，個人的記憶和社會的記憶之間不可避免的會有國家想要介入社會工程的過程，如何做才能讓其避免威權時期的那種邏輯，這中間有非常高挑戰性的平衡要拿捏。促轉會是由國家推動成立的，其背後的意義是這是一件必須由國家來做的事情。現在的政府繼承了之前的威權時期的體系以及公權力，國家機器需要自己來反省自己做錯的事情。

轉型正義議題上的困難

主要的難題是國家介入集體記憶的過程，整個社會還沒有清楚穩定的共識來支持這件事。我們會聽到很多茶餘飯後的討論，對於很多已經逝世的人來說現在來動員這些過去的記憶只是為了服務現在的政治目的。有一個領域叫做記憶研究，在談當代的很多主張行動怎麼去利用動員過往的歷史來輔助現在的目標。這樣來說的話這確實可能會被濫用，會超越原本所希望的那個反省性的記憶，但這個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要因噎廢食，因為擔心濫用所以乾脆都不要記憶麼？

社會不太可能會產生出清楚穩定的共識，這是一個很多國家社會都還在練習的課題，不止是轉型正義的討論，甚至也適用於去殖民的相關討論，去殖民的議題在歐美和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的原住民中都還在持續。以紐西蘭為例，原住民族從感知去命名自己的地方，有一種聲音是國內有人想要推動更換國名，希望不要再使用 New Zealand 那樣西方白人殖民者給的命名，更名為 Aotearoa 是符合原住民對於土地的想法，但這件事一直到現在都無法推動。這些聲音都挑戰了主流習慣的慣習，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有少數的社群告訴我們都說我們要換個邏輯來思考時，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就是會拒絕。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解散

促轉會自從解散後將他的工作業務分給了許多相關的部會，例如文化部、教育部、司法部等等。匯報是通過定期開會來設定議程，監督確認這些部會是否有在落實推動相關的工作。老實說，對於這個推動是有比較不一樣的擔心，它整個分散出去以後，往好處想會更常態化，不是一個特別的機關用很特別的預算和時間來規劃這個事情，分散在這些更常見的部門再各司其職有利長遠的來做，但缺點就是整個會變成是一個更費時的溝通，想推動任何的事情在匯報上有確認過後就分工下去了，但其有更大的溝通成本，官僚體系容易出現踢皮球的行為，可以預見會有非常多重要但是很棘手的事情會被擱置。

林家暉： 「後殖民 是一種觀點」

◎ 訪談整理 陳泓羽

一、最近的研究關注

Q：老師可以分享一下正在研究的內容和方向嗎？

A：我的研究有一個長期的設定。從我拿到博士開始找學術工作之後，就開始會有 interview，也就是去找工作就要面談。其實在讀完博士後找學術工作面談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要如何脫離你的博士研究議題，因為在博士階段之後的學術工作必須要可以獨立進行研究。那之後要做什麼研究呢？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自己設定的長期深入探討方向就是亞洲的城市跟建築。這個設定在我的研究的操作過程當中有個特殊的視角。以我目前常用的字眼來講，它大概是從一個後殖民的視角來看待亞洲的城市與建築的發展。後殖民，它其實是一個比較抽象並且很多人也對此有一些誤解的概念。我常講它像一個大雨傘，它下面其實涵蓋了很多不一樣的議題。

近期我做了一些操作，是在討論 geopolitics，也就是地緣政治。這個是我最近研究比較有琢磨的領域。它其實是空間跟政治結合起來的一個字。我們在討論空間的時候，常會談到場所，它一定跟周圍的環境、條件、氣候、文化等等相關。所以地緣這個字眼它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做廣泛定義的空間規劃研究的時候。

Q：聽說老師您還在做博物館的研究。

A：對，我做了蠻多博物館相關的研究。博物館很多研究是在探討博物館展示的意涵，或者是博物館的經營及其機構等等。我關於博物館的研究比較特殊的是，我在探討博物館建築和博物館化的現象。另外，如果用很 Foucault 的字眼來講，我認為博物館的展示性是一個知識型 (épistémè) 的概念，它會回應當下的時空背景。尤其我的研究多數會探討後殖民的情狀（或是叫做後殖民的條件）。在我的研究裡面，我會去主張比如像亞洲的城市跟建築，它展示出了一個當下的知識型。我有一個論點，就是從「知識型」來討論亞洲的後殖民的情狀。

除了博物館的案例，還有比如在亞洲的城市跟建築裡，如何經由一種博物館化的現象，觀察到亞洲跟亞洲的空間這種非常特殊的個性的探討。

Q：亞洲之外有沒有這種博物館化的現象？

A：還是有。從我出國念書之後，我受到的訓練第一個是質化的分析，第二個是比較的分析。所以雖然我現在主要在研究亞洲的城市跟建築，或者是比較廣泛的以亞洲為出發點的城市研究跟文化研究，但是我的訓練基礎是西方的理論跟空間訓練。我的研究裡面常常有跟「西方」世界的比較。因為我做的是質化研究，所以我用了很多理論觀點的分析，這其中很多是西方理論。因為畢竟現在建築學、空間規劃的學門，還是非常西方中心的。

Q：老師覺得能夠構建出東方的理論嗎？

A：可以啊。這是我研究中一個蠻主要的企圖，就是要展開一個理論化的過程。舉例來講，在我的書裡面，我都會去找尋一個核心的議題。我的做法是去找一個根植於亞洲，不管是從建築或者是從城市的生活裡面觀察到的特殊的概念。我認為在這樣的過程當中，逐漸的我們會產生屬於我們且適合亞洲的理論。

二、談談後殖民理論

Q：想知道老師您經常使用的知識論是哪一種？

A：如果你講的知識論是英文講的 epistemology，也就是它是一種系統化或者是建構知識的一個方法的話，那麼後殖民這個概念對我來講，與其說它是一個方向，不如講它是一個觀點。

很多同學可能會覺得後殖民講的是很歷史性的，或者特殊的時間段、特殊背景、特殊國家、特殊案例所建構出來的一個範疇。但是對我來講，其實後殖民是一種觀點。在我的研究跟我課程裡我常常會提到，從廣義來講，後殖民就是支配關係的一種流動狀態。

這也是為什麼我回來台灣之後，最後加入城鄉所。當然第一個原因是城鄉所需要有關建築領域方面的學者；第二個原因是城鄉所的調性跟我的研究其實是有共鳴的。在英文裡面有一個字眼叫做 consolidation，是相互鞏固的意思。很多同學會以為我只做建築歷史或者做博物館研究，但不只是這樣。在我的研究裡面你可以看到後殖民這個觀點。除了像是博物館概念的討論、建築概念的討論、城市的議題這些常見的領域，它甚至和很多我們城鄉所的老師們或同學們在研究的面向都有相關。很多城鄉所的老師們都在講參與式的設計或社區營造，但是一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參與式或者總體營造的論述最早是從後殖民的情境中基於對社會責任的回應所發展出來的行動策略。

其實後殖民它是一個很雜的概念。不過有比較本質性的瞭解：它是反對二元的對立。我們現在講多元是在講不純粹，這是後殖民理論跟批判裡面非常強調的。尤其質化研究裡，我們強調有些事情你沒有辦法一翻兩瞪眼，沒有辦法白紙黑字講清楚，沒有辦法講對錯，甚至你必須要去觀察過程而不是結果。後殖民的視角可以幫助我們更容易地看到這些面相。





▲ 林家暉老師與城鄉通訊 供圖 | 陳泓羽

Q：那看起來後殖民相關的理論課蠻有必要的？

A：因為我自己是對理論很有興趣，所以我對理論有一些鑽研，我的課多數也都是理論的課。對城鄉所同學來講，有些人可能會覺得理論深奧，有一些人甚至會覺得非常無聊，但是我覺得如果是以質化展開的研究，學生有一些理論操作的能力對於研究或者是論述的批判性是會非常有幫助。

雖然我一路都是建築的訓練背景，但是我在研究的接觸上面其實是很 transdisciplinary，在中文裡面會翻譯為所謂的跨科際。後殖民它有一個好處，它廣泛收納批判理論的觀點或者哲學觀點，在經驗性的檢視上，它還可以跳脫傳統歐洲中心論的範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拿亞洲跟泛太平洋地區的空間案例，搭配著傳統西方學門基礎的理論架構來做分析和討論。

Q：蠻好奇老師在大學建築系的背景下，是怎麼接觸到後殖民理論？

A：我剛剛有提到，我一路都是建築的訓練，所以其實我在大學部的時期，還沒有接觸到後殖民理論。我那時候對建築設計非常有熱情，當然到現在也還是。讀建築系的同學可能會比較有共鳴，我們剛進入到建築系就會被灌輸：我們要朝向作為一個建築師甚至建築大師而努力，要有自己的作品這個夢想發展。

我進入大學沒多久就下定決心要繼續念研究所。我的碩士是在台灣念的，進入碩士班後，我接觸到設計理論跟建築相關的理論，所以那時候除了設計之外，也開始慢慢對質化與理論的探討有了興趣。當我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我短暫在業界工作過，在那段時間我接觸到比較實務的建築操作，那時候台灣正好是在建築不景氣的階段，我感受到那並不是我想要生活品質，那個時候在事務所裡面，大概每天參與競圖，身體的狀況也變得不好，所以後來就決定繼續去深造，最後去到了澳洲，在墨爾本大學完成我的博士論文。也是在博士階段，澳洲的多元文化或者是所謂的後殖民語境的環境之下，我開始發現空間研究領域中各種面向的理論跟經驗的線索可以被放在一起來探討。所謂的多元文化，就是東西文化，或者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爐。

後殖民其實是一個相對冷門的領域，有很多學者認為後殖民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發展到巔峰後就開始走下坡，或者是失去用處。不論是後殖民研究，還是在建築或空間領域的後殖民論述，現在都相對比較弱勢。但是對我來講，它還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舉例來說，現在很多人還是在講全球化，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全球化這個概念它是一個很中性客觀的擴展

的現象過程，但其實不是，全球化其實是有支配、利害關係的，它會有非常複雜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結盟跟對抗，對我來講其實這是非常後殖民的狀態。

Q：這種結盟和對抗產生會是政治方面的影響嗎？

A：看你怎麼去定義政治這個字眼。它可以是非常民粹主義非常狹隘的一個概念，它也可以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政治是帶有影響力或是帶有企圖的各種活動的暗示。在我們分析空間的過程當中，尤其是質化分析，我們要跳脫敘述性的，好像事不關己的記錄。我們要盡可能地去探究它背後的目的性、意識形態的牽引。當我們在探討這些衝撞、結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去看待這些無形的各種不同的企圖、力量之間的角力的結果會怎樣呈現在建築或城市的樣態上。

空間勢必要從被視覺化，被物理環境化的脈絡來觀察。所以不論我們討論的是意識形態、文化政治還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政治經濟學，都可以去觀察一個大線索，就是很實質的建成環境與產業的發展。所以再回到後殖民這個觀點，它對我來講是在我研究裡很有幫助的一個工具。

▼ Sinophone represented spatiotemporally in Singapore. 供圖 | Chia Hui Lin



Q：很好奇老師對理論這麼感興趣，有沒有上過哲學相關的課程？

A：有，在澳洲尤其是在墨爾本大學，它是一個非常學術研究型的大學，是在質化、人文領域建築學研究上都非常熱絡的一個學校。所以我在那裡學習跟教學的期間，也有去參與過很多哲學相關的課程，這也為我提供了很大的養分。我對理論非常有興趣，因此我的很多研究非常依賴批判性理論。在建築學的傳統理論裡，比如在講結構、現代性等，也常常要去運用這些理論。現在很多的城市研究中也要運用到相關的哲學理論。



Q：前面提到傳統的建築學，老師您覺得傳統建築學還是有所幫助的嗎？

A：當然有。建築字眼本來就是非常西方中心的。建築學、建築師的職業概念，其實都是西方的知識界建立出來的。所以既然我們今天在體系裡面，某種程度也是全球化的一個現象。我們今天學建築講建築，我們就是在傳統建築學的脈絡裡面，所以當然有一定的用處跟價值在。我們今天要把傳統強調起來，我們也要試圖去探索傳統之外的可能，因為傳統有一些局限性，它有一些不想讓你知道的事情。就像我剛剛講的後殖民他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支配關係的流動狀態。既然我們知道建築或者傳統的空間規劃理論是非常西方中心的，這代表在西方的脈絡之外可能會有一個知識體系，沒有辦法用西方知識解釋，或者是沒有辦法解釋得很好的一個情況。

舉例來講，在亞洲有很多非正式性空間，比如在台灣常常可以看到的夜市或違章建築的空間現象。在傳統的建築或者是空間理論裡面，它會把這種空間現象歸納成未發展或混亂，



▲ Green infrastructure as a form of tropical modernity in Singapore.

供圖 | Chia Hui Lin

但是近幾十年的研究裡面，我們發現其實這並不是這麼單純的所謂未發展或混亂，而是它可能有一個在傳統的理论體系之外的一種特殊的邏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強調傳統的價值之外，我們也有必要思考更適合西方體系之外的空間案例的方法論。

三、和城鄉所的互動狀況

Q：老師認為城鄉所的學生有什麼不同？

有沒有毫無建築背景的學生上過老師的課？

A：我來到城鄉所後，我發現台大一直都有為數不少對於建築、城市、空間非常有興趣的同學。比較有趣的是在台大以往與建築相關的課程比較散落也不明顯，所以我來城鄉所之後肩負了一個很大的任務：協助成立並執行學校的建築設計學分學程，學程面對的是台大許多對建築、設計、空間有興趣，但不是建築相關訓練背景的同學。我自己目前開的課，不論是設計課還是我們所裡面的實習課，或者是我自己的理論課，其實多數都是非建築相關背景的學生。

我覺得對比以前我和純建築科系同學的互動來講，非建築背景的學生在專業知識的訓練基礎上是有落差的。但是我個人認為這不會是弱勢，反而可能會是一個優勢，也就是說，學生可以跳脫傳統建築學僵化、固定的意識形態觀點，學生可以有多方的視角。我覺得台大或者是我們城鄉所同學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同學們都是帶有批判性的。所以在我自己研究或者我指導的學生論文裡，我常常會提醒他們，你不要只做敘述性的，descriptive 的陳述，還要反思自己的立場。

Q：請問老師，如果有的學生害怕自己的立場是錯誤的呢？

A：這就是我剛才一直在講的後殖民視角，它無所謂對錯，它是對抗二元的。二元的話，不是 1 就是 2，不是對就是錯。但是後殖民視角中當你被敘述成錯的情況，可能是一種支配關係的對立面。在某些情況之下，對立面有可能會轉向跟你結盟，它會變成是對的。所以我鼓勵我們所裡面的同學們有一個立場。在後殖民研究中有一個論點非常出名，就是一個有效的後殖民論述一定要有一個清楚的立場，立場讓你有一個出發點可以開始展開論述。質化的研究也是這樣，因為質化研究跟量化的研究不一樣，它沒有數據作為參考，它是從零開始，無中生有。所以最困難的就是從什麼都沒有，發展出一個論點。這個出發點無論是被批判的，還是孤立無援的，它至少都是一個出發點和立足點，提供了理論化的一個線索。

Q：這個出發點是要通過閱讀大量的文本得到的嗎？

A：一種方法是透過大量的閱讀，但是我認為，閱讀不見得一定是讀書，建築、空間本身也可以是文本。所謂的閱讀文本也有可能是走訪空間，體驗城市。雖然我的背景是建築史論，但是我講理論，可能講得比歷史多。所以我常開玩笑說，我是論史，而不是史論。要發展理論，當然你要有一些觀點的瞭解，這些觀點你當然要透過學習、閱讀去建立起來。

Q：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田野經驗？

A：我大多數的研究經驗是在國外，所以田野這兩字其實我一開始不是太熟悉。我回到台灣之後，我發現很多人會把田野看成是草根的、本土的，在英文叫 down to earth。但是我在國外，尤其作為一個亞洲人，到西方世界轉了一圈後發現，田野與其說是我剛剛講的定

義，不如講是經驗式的。對我來說特殊、印象深刻的經驗，並不是像很多同學講到要去到社區，要去蹲點，反而是很經驗性的一手資料的接觸。比如一個亞洲人進到西方的群體裡，或者是一個都市人進到非常原生態的社群裡。尤其像我在東南亞教學研究的那段期間，我才深深地體會到，我們在台灣常會講多元文化，但是在台灣至少還有共同的語言平台。但在東南亞很多地方，比如我在馬來西亞工作的時候，我才知道哪怕在同一個地方，也會找不到一個共同的語言，找不到一個共同溝通的平台，在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依照非常特殊的經驗的形式去建立一個訊息傳遞？我覺得這是比較特殊的田野的情況。

Q：老師您對我們城鄉所的學生還有什麼建議嗎？

A：就如我剛剛說的，我覺得城鄉所學生有很大的一個優勢是有一定的批判性，有一定的立場取向，不論立場是什麼，我覺得都是好的。借著這次機會，我如果可以跟同學們有一些訊息的交換，我想說城鄉所是一個平台，它有發展各種取向的可能性。

後殖民觀點，它也並不是在傳統的歷史或是政治的場次、場域裡探討，它有能力去探討更應用性的和空間性的面向。我這學期參與實習課程，很多同學在談生態，談所謂的綠色基盤，談參與式設計和社區營造，其實我都會跟他們聊到後殖民視野在這些領域也是有潤色空間的。

實習課有一個很大的價值，它可以讓同學們意識到城鄉所的公約數也就是空間這件事情。第二個是透過實習課的操作或辯論，可以幫助同學們在展開自己研究之前試著去提出該有的批判性的觀點。

Q：老師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教授的日常嗎？ XD

A：我就是因為對於研究和教學有興趣才會離開業界走進學校。從我開始參與教學跟研究，到現在已經將近 20 年了。做教授的日常，比較現實地講，在我有家庭之前，我可能可以一天 24 小時，一禮拜 7 天都在閱讀，在思考研究相關，不論是教學或者是指導，或者是書寫出版等等。但是在有家庭之後，我覺得可能到這個年紀，是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所以也會有一個平衡。現在可能有一些日常，就必須要去照顧小孩，哈哈，回歸家庭。在學校還會有一些行政或者是服務的事情要做，但是我覺得我還是非常有熱忱地在研究思考、理論化。



楊竣宇

◎ 訪談整理 林佳蓓

一、關於所辦工作

Q：當初為什麼會接下這個工作？

A：接這個工作的時間點是在我論文口試前幾週，論文初稿剛完成時。秀妹姐那時一個人處理所有事情，她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辦打算找人來幫忙。我剛好畢業前後有等當兵的空檔，王志弘老師就問我要不要接，我也正好開始準備建築師考試，所辦工作在我的想像裡不算太複雜或太累，工作之餘應該有一些時間可以準備自己的事情吧，就決定接了。

Q：你覺得這份工作會很辛苦嗎？

A：不會，我大概花一兩個星期的時間摸索工作步調，這份工作都是在處理行政的事情，只要掌握節奏和速度，就不會很辛苦。行政工作比較細瑣繁雜，我後來建立了一個習慣，把每天要做的事情都用 excel 條列式記下來，這樣就很清楚知道什麼事已經做了、什麼事還沒做，以及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事，這對一個行政工作來說非常重要，只要按表操課，跟著良治所長、秀妹姐的教導，就可以不辛苦地完成大部分工作。

竣宇於 2022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擔任所辦行政助理，協助處理所上事務。我們邀請他來聊聊工作上有趣的事，也以一個剛畢業的校友身分分享研究所的生活和寫論文的小技巧。

Q：同時作為所辦職員和所上學生，在這兩個身分之間的切換有什麼特別感受？

A：比較有趣的是，我有一些畢業手續是我自己辦的。學生角色比較像媽寶，所辦好像要幫學生打理各位同學應該自己負責的事情。我後來才發現自己還是學生的時候也會這樣，所以一邊當職員一邊當學生，就特別能體諒所辦的麻煩角色。

Q：工作上有遇過什麼有趣的事嗎？或是八卦？

A：我講一個比較驚悚的。大約六七月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我進辦公室的時候覺得味道怪怪的，好像屍體腐爛的味道，但所辦本來就有發霉的書味，所以我一開始沒有多慮，只是把窗戶打開。後來秀妹姐進辦公室之後就說怎麼味道怪怪的，她過幾分鐘後突然尖叫，有一隻死老鼠！而且那隻死老鼠就在秀妹姐座位前面的盆栽旁邊，所以老鼠流出來的體液混著盆栽流出來的水，超級臭。我戴著手套清完，老鼠的尾巴痕跡還留在櫃子上！但鼠患應該是長年無法解決的問題。。。

另外，因為林智堅抄襲醜聞，學校開始要求學生的論文要做原創性比對，但學校的原創性比對系統沒有開放給學生。一開始是老師和行政職員都可以用，學校說要請行政職員幫學生做原創性比對，但有行政職員認為職員沒有領論文指導費，不能幫學生的論文負責，這些職員在群組信裡開始抗議，後來行政職員的權限就被關掉了。那時候發現臺大公務員其實滿有自己的想法，可能還有點兇，不是什麼都長官說了算，很有趣。題外話，王志弘老師給我們的論文比對標準是 1%，因為如果都有正確引注參考資料來源，不太可能會有整段一樣的文字，所以對王老師來說，只要超過 1% 的都叫抄襲。

Q：工作有沒有犯過什麼錯？

A：我這三個月犯過最大的錯應該是所務會議少訂一個便當。因為我中午很準時吃飯，時間到我就把我的吃掉了。下午開會的時候才發現少一個便當，但是秀妹姐吃飯比較晚，所以秀妹姐的便當就給老師吃，我就害秀妹姐沒飯吃，但我後來有給她一個布朗尼賠罪（笑），真是不好意思！

另外也有在招生工作上犯過一些錯，學校的招生簡章每年都需要校稿好多次，確認各組

名額、考試條件等內容。我的工作是跟擔任本所招生委員的老師和校方行政人員之間的橋樑，稍微複雜。有一次我把名額的數字弄錯，還好王老師有發現指證，才沒有讓小錯變成大錯。

Q：覺得這個工作適合什麼樣的人？

這個工作適合想要作息穩定、沒什麼特別慾望的人吧，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工作壓力，單純處理所上的工作是很游刃有餘，蠻輕鬆就可以把工作完成。一天上班八小時，我大概用斷斷續續的 2~3 小時就可以完成工作。我在所辦工作期間也養成早睡早起、作息穩定的習慣，對於身心健康還滿不錯的。

二、關於研究所生活

Q：在整個研究所時期的時間分配是如何？

A：以整個研究所的生涯來訂時間規劃的話，我原本設定二年半畢業，最晚三年（最後用了三年）。用三年往回推的話，大概就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一定要完成什麼事情。我大學建築系已經唸了五年，所以不想要再更晚畢業。假設論文要寫一年，那最晚碩二一定要把計畫書考完，碩三再考論文口試。

Q：可以分享寫論文的過程嗎？

A：我都是前面一直玩一直玩，後面快要不行或老師真的要生氣的時候才會開始爆寫。模式上我大概分成「完全都在玩」和「完全都在寫論文」兩種，完全都在玩的模式就是只準備上課、跟老師報告進度的東西；完全都在寫論文的模式就會早睡早起，把自己黏在椅子上面，盯著螢幕，就算寫不出來還是會把 word 打開，把手放在鍵盤上面，逼自己要坐滿八到十小時，可能想了幾小時只寫了 500 字也沒關係，反正就是不要開 Youtube、Netflix 這些網站，或是把網路關掉、把手機拿到看不到的地方，雖然很像高中生，但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很有用，一開始可能真的幾個字都寫不出來，白白「坐」一天，不過反覆閱讀自己寫的東西，就會慢慢找到一些寫作的步調。



▲ 竣宇與城鄉通訊

供圖 | 林佳蓓

Q：寫論文有什麼小技巧嗎？

A：對我來說碩論很像做練習題，所以我以先把論文寫出來為目標，不會一直想要把論文寫到很好，如果一直想要寫好，可能會沒有進度，很老古板地說，就是先求有再求好。王志弘老師會先跟我把章節討論出一個架構，然後依著這個架構，我自己再去計劃每個章節的內容跟篇幅，從一開始條列式地寫出骨架，再慢慢填肉進去。比如一章有三到五節，每一節要寫 5000-10000 字，這 5000-10000 字是有架構的，會分成前面 1000-2000 字第一小節，中間比較大的篇幅是第二小節，後面 1000-2000 字是小結論。把這些東西擬出來之後再開始寫，這樣每個最小的單位只需要寫 500-800 字，努力去把每個單位填滿，就比較不會有一直講重複的話，或是沒有組織的問題。

Q：寫論文和跑田野會同時進行嗎？

A：我是邊跑田野邊寫論文，但如果不能同時進行，一定要選一個先做的話，那對我來說一定是先做田野。因為如果只有空想，從田野拿到的材料就不一定可以支持論文假設的架構。如果不知道怎麼辦的話，可以先建立二手資料，比如做一整本書的摘要（如果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文獻），做一整本書的摘要和跑一個禮拜的田野，對於幫助論文找材料可能會有差不多的效果，再從這些材料裡面找出可以論述的章節架構。

但這些都是我自己土法煉鋼的方式，我相信每個人適合的寫作方式不一樣，一定有很多比我有效率又聰明的方法，上述只能提供參考。

Q：有推薦所上的什麼課嗎？

A：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先找到論文的方向和指導老師，然後就全部都修指導老師的課就好。碩士其實很短，在有限的學分數裡面，要好好跟著自己的老師。如果把學分數修在別的老師身上，就會讓指導老師不太了解我，同時我也可能不太了解自己的指導老師。王志弘老師的「空間文化研究」對我的論文有滿大的幫助，首先是這門課牽涉的議題很廣，但也不是泛泛而談，這能幫助我把論文的議題理論化。再來就是這門課有嚴謹的作業要求，我完成報告之後幾乎等於完成論文的其中一到兩個章節。我碩二的時候也有修其他自己喜歡課，像是家暉老師的兩堂課（當代建築、當代亞洲的後殖民空間再現）我都認為步調很宜人，談論議題的深度很剛好，適合初入門建築的城鄉所同學修。

Q：未來工作有什麼規劃？對於職涯有過什麼焦慮嗎？

A：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我碩二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對於畢業後要做什麼極度焦慮，大學同學可能已經工作兩三年，賺了一些錢、累積了一些經驗，甚至申請到常春藤名校，然後我什麼都沒有，那時候就會一直懷疑自己。畢竟這個社會就是強迫我一直跟同儕比較，雖然又累又緊張，但同時壓力也是動力，逼著我趕快畢業，往下一步走。

Q：面對焦慮是如何調適的？

A：如果沒有很長期的目標，可能可以設一些短期的目標，比如說什麼時候要畢業，為了要畢業，每天要坐 word 前面幾小時、有考試就去準備考試、要找工作的話就提前準備作品集，每天要做幾頁。畢竟如果只是單純焦慮卻不事生產的話，就沒有辦法找回對生活的控制感，我後來發現「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覺對我來說很重要。如果每天寫一點論文、跑一趟田野、看一點書，好像就會覺得自己有做點什麼，就不會這麼焦慮。但我對於我未來要做什么還是沒有特定的答案，可能也還沒有自信一口說定（中國用語叫做「立 flag」），我有準備一些考試、現在也在建築師事務所上班、也正準備跟王老師一起把論文改成期刊。有好多事情都還在進行當中，我想在還沒有答案的時候，就什麼都繼續做吧！

關鍵字：

基隆人、嘻哈文化、傳統市場、非正式聚落、難民營

▼掃 QR code 可聆聽林偉的音樂作品



林偉：

◎ 訪談整理 林佳蓓

穿梭在全球與地方之間的實踐者

在城鄉所看見建築的其他可能

林偉大學就讀建築系，就讀城鄉所的契機是他認為建築似乎還可以做其他事，而不是只有做模型、做設計。他認為建築系是在學習發掘空間或社會的問題，並用建築的技術、設計的創意去解決問題。但



▲ 林偉 供圖 | 林偉

來到城鄉所之後，他所遇到的是，理論課推翻了過去所學的內容。林偉也提到自己在大學時期是個叛逆的學生，時常因對於建築理念的不同，而在課堂上和老師爭

吵。但他到城鄉所之後發現，所上老師教的東西是他不懂的，因而激發起學習的欲望，同時削弱自己過去在校園的稜角，更加謙卑地去學習。

嘻哈的啟蒙時期

林偉從小學就開始接觸嘻哈音樂，因為那個時期唱片行仍蓬勃發展，所以他很常在閒時時候去逛唱片行、聽音樂。起初他因為英文不好，並不知道自己聽的音樂在說些什麼，只覺得很特別，和平常所聽到的音樂不同。後來到國中開始學英文後，才逐漸了解嘻哈音樂裡的內涵，也因而開始喜歡音樂、更開始學習做音樂。高中到台北唸書之後，他認識了更多擁有同樣興趣的人，在和同儕們一起玩音樂的過程，開啟他的饒舌之路。

嘻哈文化走進傳統市場

林偉和他的夥伴們在基隆惠隆市場租了一個空間，當作辦活動的空間以及工作室。選擇這個市場作為據點的原因有二：其一，租金便宜；其二，市場裡的店家也因為從小接觸而熟識他們，惠隆市場成為他們小時候共同的記憶。在受到在地宮廟的舞蹈表演邀請後，他們開始思考和傳統市場接觸的可能性。恰巧當時林偉也正在基隆市文化局擔任駐府人員，因而開始和市政府有了接觸。於是他們透過文化局的社造及產發處的青年行動計畫，開始在惠隆市場展開一連串的行動。

▼ 2021 年惠隆市場走讀活動照片 供圖 | 林偉



惠隆市場因屬於私有土地，政府並沒有太多介入，網路上也缺乏對於市場的文史資料。他們透過執行計畫的機會，希望彙整惠隆市場的文史資料、蒐集當地的歷史故事、錄製 podcast 節目，目的是梳理市場的故事和脈絡。他們也在這個過程中和市場的店家們越來越熟識。

為了要和社會大眾介紹這個市場，團隊也辦了走讀和展覽，展覽的內容是市場的歷史照片。不過林偉也說道，蒐集歷史照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對當地人而言，惠隆市場就是日常生活，在底片相機時代，更不會在日常生活中拿出底片相

機拍照，所以取得的照片很有限。因此為了展現市場的共同記憶，他們把市場的元素和印象透過塗鴉的方式描繪出來作為展覽的一部分，也拍攝宣傳影片、撰寫文章介紹店家等方式活化市場。

嘻哈音樂的出現並非偶然

在林偉眼中，有他自己對於嘻哈文化的理解。他從書中發現嘻哈文化並不只是單純反叛、耍酷的青少年次文化。所謂「Hip hop」是 1973 年出現的名詞，是因為在 1973 年前所發生的事情，才導致嘻哈的出現。黑人雖然在 19 世紀末得到解放，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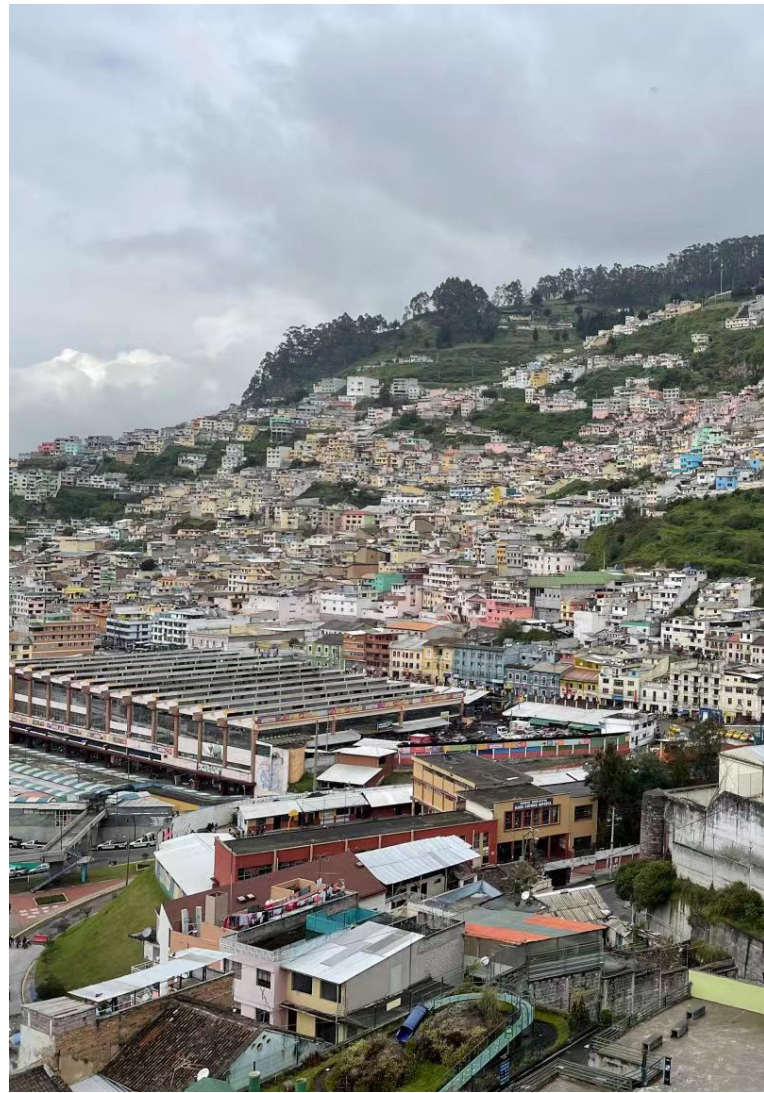
▼ 2021 年惠隆市場文史展演活動照片 供圖 | 林偉



這個解放南方傳統農場主與北方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間鬥爭的結果，黑人實際條件與社會地位並未有太多改變。而在這之後的 1920 年代的哈林文義復興（Harlem Renaissance）、一直到 1960 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都對嘻哈的誕生產生很大影響。

西方音樂傳統是充滿貴族氣息的大樂隊，可是黑人從奴隸制時期逐漸把這些音樂轉變成自己的東西，因而發展出藍調、爵士、搖滾、放克到嘻哈。林偉認為黑人的音樂是一個去菁英化的過程，他們把西方的音樂變成大家都可以玩的東西，更重要的是重拾在音樂、文化、種族上的話語權。

Hip hop 到 1980 年代逐漸成名後，音樂工業發現了它的商業潛力，於是開始買斷，把所有的黑人唱片公司買下來，並在 1990 年代開始包裝輸出到世界各地。所以現今我們所接收到的唱片文化都是被跨國唱片工業的資本家所包裝出來的。再加上語言隔閡，使得台灣聽這些音樂、甚至去了解的大多是懂英文且有一定的教育水準的都會中產階級。因此台灣本地所生產的音樂商品就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為某種反映都會中上階層生活與意識形態的工具，但對美國黑人而言，Hip hop 的誕生是階級鬥爭的過程。



中南美洲的社區實踐

在 2021-2022 年疫情期間，林偉於西班牙巴塞隆納攻讀國際人道援建進階碩士課程，因而先後至厄瓜多及墨西哥實習。在厄瓜多所執行的是非正式住宅的都市計畫。厄瓜多首都位於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山上，但整座城市幾乎被非正式聚落給佔據。他們所進駐的社區在過去是厄瓜多原住民移居到首都的大城市求生的非正式社區。這些人歷經過驅離及迫遷，也展現出草根力量，自主性的組織起來對抗警



▲ 厄瓜多水源保留地周邊非正式聚落狀況照 供圖 | 林偉

察、逼迫政府讓步，讓居民們續留，聚落因而被保留下來，這個社區也因此命名為 La Lucha de Los Pobres（窮人的鬥爭）。因為社區經歷過抗爭，所以整個社區組織嚴密，整個社區大約有 8000 人，每 200 人組成一個當地人稱為「manzana（蘋果）」的小型社區組織，總共有 40 幾個 manzana，都以當地的耆老命名。林偉提到每個 manzana 會有一位資深長老來領導社區，這些領導人都是當時參與抗爭的核心人物或他們的孩子，每個小型社區組

織都會定期開會、也定期有大型會議，透過開會討論社區的各種集體事務。

不過抗爭成功後政府並無管理意願，再加上人口移入，社區規模越來越大，因而伴隨而來的代價就是社區環境狀況每況愈下。於是林偉和他的夥伴們受到南美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委託，進駐社區中進行空間改善，舉凡基礎建設、住宅環境、社區綠化、閒置空間再利用都被納入這次的討論中。在經歷了幾個月的計畫執行後，林偉和團隊們產出一份報告書，提供給南美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作為推行下一階段行動的參考。

結束厄瓜多的非正式聚落規劃後，林偉前往墨西哥執行難民營的社區營造。他們所服務的難民營位於美墨邊界的 Alacran，在當地人口中有小海地之稱，社區人數大約落在二千到三千之間。在中南美洲有許多具備難民身分而準備入境美國的人，在等待美方核發正式文件的期間多半會就近待在墨西哥。因此在美墨邊界墨西哥這側的城市邊緣（例如垃圾場）就會出現難民組成的非正式聚落。這些難民營的狀況很特殊：在一般情況下，非正式聚落的住戶多半會長期居住，而這些難民則已具備身分，只在等待入境文件，每天日常就是前往邊界辦公室詢問文件流程，所以大多只會短暫居住幾個月甚至幾周，使得大家對環境又更加不在乎、導致這裡的環境狀況比起一般非正式聚落更加惡劣。



▲ 墨西哥中南美難民營兩座社區廚房施工照 供圖 | 林偉

林偉主要負責難民營裡的社區廚房興建，並擔任監工角色。特別的是，因為這裡是難民營，所以當地教會、建築師與工頭皆表示難民本身沒事做，且找難民來當工人不用顧慮任何勞工權益保障、每日可排三班、工地 24 小時都可施作，也因此在林偉實習的三個月期間就完工了兩棟約 100 坪的社區廚房。除了興建社區廚房，他們也興辦環境教育，教難民們垃圾處理、上廁所等等他們原本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不過林偉說道比較可惜的是，因為難民居住時間很短暫，所以無法與他們建立較深厚的情感。

國外經驗的反思與看見

林偉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也從過程中有所反思，提醒城鄉所的學生們不能沒有專業，研究所期間訓練的專業很少，要靠自己建立穩固的專業基礎，因為做社會實踐仍然會需要專業。不過他也提到，具



▲ 墨西哥中南美難民營公共廚房地坪灌漿施工照 供圖 | 林偉

備專業之後也不能以此為傲，在做規劃時，專業者有其必要性，但當地的需求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林偉說道，例如現正負責的莫三比克重建中，當地有許多國際 NGO 進駐，雖然經過與當地居民的對談，不過很多時候專業的評估與當地需求之間還是無法取得平衡點，而出現不符合需求的情況。

特別的國外經驗也影響了林偉在回台灣後的工作方向。林偉目前擔任慈濟基金

會的建築工程師，承辦非洲莫三比克重建案，他未來也將持續往災後重建及人道救援的方向努力。

洪秉澤

◎ 訪談整理 秦沐涵

此次我們邀請到洪學長來與我們分享經驗，學長作為「南機拌飯」的成員，將會以參與者的身分與我們聊聊合作社的那些事。

Q：為什麼會想要來城鄉所唸書？

A：我是屏東潮州人，大學在逢甲念建築系，畢業設計是做潮州的規劃，這不太像建築系的題目。那時候的野心比較大，想要做全區規劃，後來就發現畢業設計在做的規劃和城鄉所在做的事情有些相近。當時作為建築系學生，就在思考要如何復興一個越來越沒落的地方？在做畢業設計的過程中一直都沒有找到解方，只想到用觀光或建築再利用的方式來解決。所以後來就想說來城鄉所學習，希望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就順其自然地進來了。





▲ 南機拌飯中的秉澤 供圖 | 洪秉澤

大學時在建築系學習了很多建築設計的工具和解決建築設計的流程，但是大學沒有學到如何去深入地思考社會關係，所以有很多物理性或是數據性的設計解方會很著重在操作手法上，認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一個地方（以潮州為例）的沒落，通過引進人流，就可以達到復興。但進到城鄉所後才知道這件事並沒有這麼簡單，在其中還有很多社會性、歷史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等都需要處理。

Q：進來城鄉所學習到最多的東西？

A：讓我自己覺得學到最多的應該是觀看事物本質的訓練，與先前在建築系做的訓練差距很大。以前大學的時候也會有這樣社會性的思考，但幾乎沒有理論做支持，同時大學更專注於技術性的訓練，並沒有過多時間去思考研究社會性的問題。

印象最深刻的是碩一的時候理論課與實習課同時間的交互對應，將理論課所學習到的理論放到實習課上去思考，同時理論課讓自己在看待事物本質方面上不會再像以前一樣從很單一的角度去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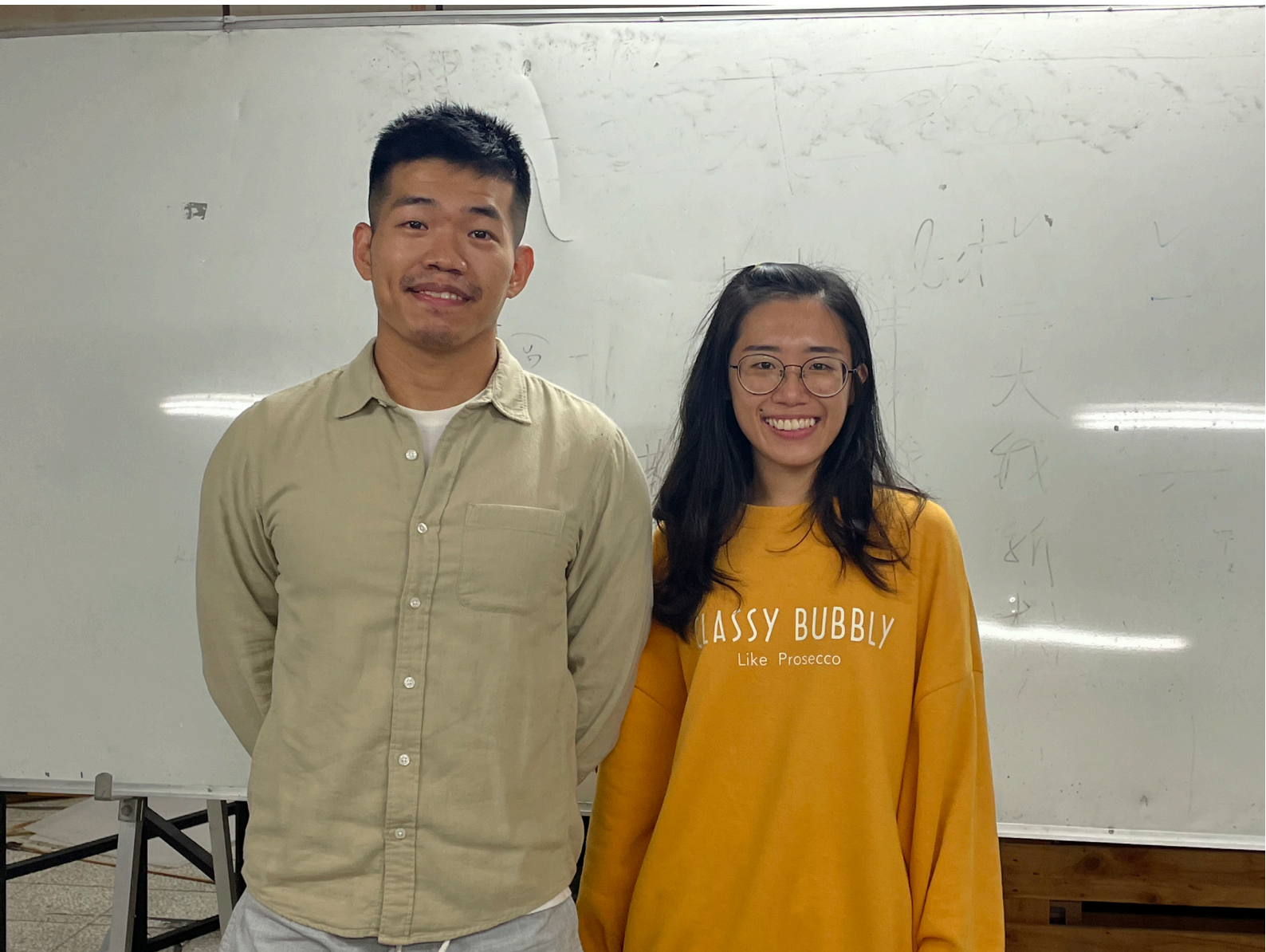
Q：在進入城鄉所後有沒有遇到令你覺得記憶深刻、或是影響你很多的人或事呢？

A：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發現以前在建築系時很多東西都沒有在好好做研究就急著開始設計，沒有很扎實的地方研究背景。但是實習課不一樣，實習課的前期操作手法和以前在建築系做基地調查的手法非常相似，都是一些工具性的利用，類似做基礎的物理分析研究、淺顯的歷史性研究、做模型等，所以在實習課前期我都還蠻得心應手的，但後來加上理論課的理論應用，以及不同領域的同學在同一組，會發現很多在建築系時沒有注意到的盲點，在那個時候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Q：接觸合作社的契機？

A：接觸到合作社是碩二上的寒假。在南機場的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的駐點工讀，這是第一個契機。後來賴仕堯老師的實習課是帶學生做南機場的保留提案，這是第二個連結。再後來在兼職的時候做都更需要一些地方團隊幫忙調查，就與當時「南機拌飯」的成員一起合作去做社區的弱勢戶調查，有了那一次的合作後，開始逐漸認識他們，認為這個團體很有趣，可以多接觸。

後來離職了兼職的工作，剛好修習了台大社工所陳怡好老師和城鄉所黃舒楣老師共同開設的「照護住居與社區」課程，他們的一個基地也在南機場，就直接去南機拌飯跟他們一起合作了一個社區孩童的課程，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加入了「南機拌飯」。那時合作社的入社機制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大家至少要合作過一個案子，以此來觀察和入社者合不合得來、做事如何、價值觀如何等等，於是在合作過後通過社員大會投票後順利加入社團。



▲ 秉澤與城鄉通訊 供圖 | 秦沐涵

什麼原因促使你想要留在「南機拌飯」？

經由上述兩個合作途徑更加認識了合作社，同時也意識到這群人背景很不同。與城鄉所的訓練有些相似，大家來自不同的專業，自己去想辦法寫案子拿案子來做。碩一實習課與理論課對我來講是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在碩二又親身接觸到一個組織在做跨領域並實際接案子的事情，空間的形式與城鄉所以往接觸的一些草根性、街區性的組織有些許相似，想到這個組織與碩班延續的學習背景很像，除卻在學校的場域外面還能有一個實際的場域工作實習，認為自己是值得留下來的。在「南機拌飯」那個地方我看到自己成為社區的鄰居，我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持續發展一直延續下去，相比實習課紙上談兵的結論來說，「南機拌飯」對我的衝擊也更大，做的事情是真的可以影響到人，他會有實質帶來的後續影響。

Q：「南機拌飯」這個空間如何凝聚社區的？

怎樣跟其他的社區或社群建立緊密的連結？

A：在還沒有進去「南機拌飯」的時候，第一代成員是以做社區營造的心態去到那個地方，大家會將做事情的核心放在與居民互動為主，慢慢與社區的居民熟絡。當時的成員會被貼上「地下室的有愛心的志工年輕人」的標籤，這個標籤會讓人沒有戒心。另外，我們在做的事情都是對居民有好處的，居民基本不會排斥。在社區居民的部分還有一些原因與這個社區的性質有關，這個社區有五個門，且都沒有門禁，可以隨意進出，常常會有不是社區的人進入到社區裡，同時地下室的空間原本是市場，待市場停業後又出租給其他人來當倉庫或者工作室，因此社區一直持續的有外來者進入，所以社區居民對外來者並不陌生。

從社群的部分來看，因為第一代社員本身就有一些組織基礎，大家一直都將社群聯繫放在心上。再加上空間的經營模式比較開放式，並且是大型的彈性空間，共享性高，因此其他組織也有意願過來一起共事或者借用。

但社區的部分後來也有一些變化。大家在做社區營造上會有一些關係的磨損，後續更多的會想要做自己的事情，慢慢就產生了一種以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前提下與社區互動的氛圍，比較認同的方式是將自己當成是社區的好夥伴，不會讓自己成為一定要幫社區帶頭的領頭羊。如果有一些案子對社區有益，我們就會去接觸，但平時更多的時候會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 社區中的孩童課程 來源 | 洪秉澤



社區互動與社區凝聚大家的初衷都是希望當個好鄰居，但後續未必都會去做社區營造，而是以社員的興趣為主要發展方向，這樣才不會持續地磨耗大家在合作社裡的動能。

Q：「南機拌飯」這個空間對學長來說意味著什麼？

A：這個地方是我自己的第一份正職工作，之前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工讀或者實習。在這裡我就是老闆，我要對自己做的案子負責，也要對自己的收入負責，會很現實地想到要如何賺取生活費——既要負擔自己的支出又要養活這個組織。我現在回頭看，這是一個蠻理想的組織與工作環境。在公司作為僱員只需要擔心自己的收入與被指派的工作，以公司老闆規劃的公司方向去努力，但是在這裡我們要想辦法思考我們要的方向是什麼，除卻賺取收入之外也要思考如何繼續經營下去這裡。

常常在空閒時與同事聊天，自覺在公司中與同事常常會是競爭關係，但在這裡反而會是真正的共事關係，大家都是平行關係，沒有什麼利益糾紛。在這個職場上是個非常理想的狀態，大家要面對的都是社區居民、市政府、文化部，即使內部真的有問題，大家也可以通過開會討論來達成共識，這都是建立在平行關係下的。在這裡，我需要很有主動性地去思考如何讓組織往更好的方向去前進，但同時我也有權力去對某件事情發聲。所以作為第一份工作，它對於我在心中建立的工作環境下做事方式會比較有影響。

▼ 南機拌飯的社區客廳 來源 | 洪秉澤



Q：大家一起工作開會的時候是如何互相妥協的？

A：我們通常會有專案分配。一個案子來了就會有幾個人說我們來做這個案子，其他人並不是這個案子的主責，所以會以這幾個人為主來執行方案，這樣就會減少一些聲音。

也會有吵架的時候，例如如何去面對社區居民管理費的問題，究竟要不要深入社區的關係，大家都有一些歧意，關係磨損會比較嚴重。但在這個過程中大家會用不同的手法去解決有歧意的事情。

Q：面對社區居民管理費的問題磨損嚴重的過程？

A：這是一個文化部的案子，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收到的錢並不是那麼的單純。例如說我們受補助十萬（虛假數字），但因為那是配合專案的經費，政府經費有一定的核銷方式，代表這個數額會被拆開，對於這個方面居民完全無法理解，認為為什麼補助十萬但最後沒有全部拿出來給社區繳納管理費，反而還要拿部分的經費去做其他推動發展社區組織的經費，或是印社區的傳單、文件、海報等，這些消耗都是居民無法理解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消耗是什麼，但對居民來說這磨損了他們對我們的信任，我們也會覺得解釋會讓他們覺得我們在騙他們，這個過程讓我們自己也很難過。認為我明明是在做一件對社區有幫助的事情，但卻又不被他人所理解。同時社區的發展協會的理事長的選舉又有角色站邊的問題，跟誰走得太近都會被另一方不信任，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去處理很多的人際關係，所以大家會感覺到很疲憊。

這與我們一開始自己想做的東西有所出入，所以希望回到原本的初衷，最好還是以個人能動性為主。

Q：在停業前有什麼反思？

A：後來有陸續參加一些合作社的講座，遇到了一些前輩，與他們交談後感觸很深，前輩不太建議年輕人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就直接經營合作社。我們整個合作社的運作是需要更多的資金才能夠運作的更順利，這也回應到我們中間有資金周轉不足的問題。回應到個人方面，個人沒有什麼財力，但藉由合作社這個小組織，大家都丟股金下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去做案子，這對我這種小白來說有很大的幫助。

另一方面在合作社裡只有我是建築背景的，就我這個領域能夠在這裡學習到的東西是比較有限的，沒有這方面的前輩能夠傳承給我，我需要自己去摸索，有的時候會很難找到出口。

另外我們沒有能夠與業界競爭的有效模式，在專業能力上的取代性會比較高，唯一的強項就是地緣關係與社群關係。

Q：有什麼話想要對城鄉所學弟妹說的？

A：大家趕快寫論文，寫完論文海闊天空！

在碩班時期要自己賺生活費，會有工作壓力和生活壓力，研究所這邊就沒辦法很專心的寫碩論，當時的課業壓力也蠻重的，會感覺身心壓力都很大。希望大家能夠照顧好自己，好好聽老師的話，安排進度，後續才比較不會有太大壓力。

玖樓——

共生居住空間

◎ 訪談整理 陳泓羽



一、關於城鄉所：

Q：請問學長在進入城鄉所之前有想過自己未來的職業規劃或者想要做的事情嗎？

A：在進城鄉所之前沒有職業規劃。進入城鄉所的動機是，相對於傳統的都市規劃系所，城鄉所的範圍比較廣泛，不論是政治經濟上的還是地方性的城鄉研究，因此我們可以比較全面地去理解都市議題。我大學是念土木跟環境工程，工程和城鄉所所學的東西差蠻多的，我想要念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 玖樓 供圖 | 潘信榮

潘信榮大學就讀土木和環境工程，在城鄉所期間獲得了不少田野經驗，也接觸了公司經營和創業以回應地方議題，並且在城鄉所期間由於自己和朋友的切身租房的經驗和需求而創辦了玖樓——為都市年輕人打造具有歸屬感和生活價值的家的空間，創造社會聯繫，提供服務。玖樓的模式與合作住宅有相似之處，也有所差別。

潘信榮認為製作簡報，評圖報告，以及實習課、參與老師的研究計畫，都對學生將來進入社會會很有幫助。

Q：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感覺受到一些挑戰？

A：城鄉所的實習課或所謂的規劃設計，用到設計的地方沒有到那麼多，像是 sketch up、autocad，基本上原本念土木都會，所以我覺得比較困難的是社會科學領域的部分，像一年級王志弘老師的理論課，如果沒有社會科學背景的話，念起來會比較吃力。

Q：對實習課還有什麼印象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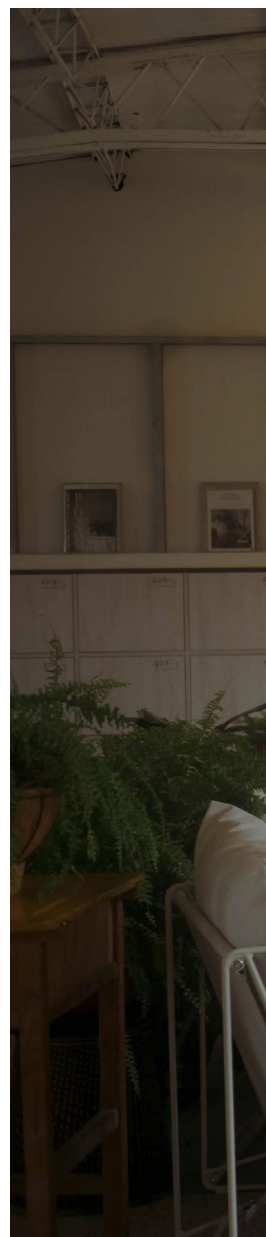
A：我印象最深刻的田野是在中國山西太行山下的鄉村，應該在離太原 3 個小時車程的地方。那時候我們做一個藝術村的暑期實習。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中國大陸的非都市的地方，風景非常漂亮，房子也很有歷史，隨便一個路邊的老房子，可能都有三四百年、四五百年以上的歷史。有種身處歷史課本中中國古老歷史的感覺。

那節課類似於做農村再生計畫，那時候地方政府用藝術節的方式來舉辦，把農村裡面的房子改造成農家樂（等同於台灣的民宿）。我們有點像是做藝術節的專案，把來自國際上各個地方的藝術家帶到一個中國的鄉村裡面，藝術家住在居民的房子裡，我們要重新活化那些閒置的空間部分，所以需要跟藝術家和當地的住民溝通。

Q：在城鄉所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

A：另外一個花了比較多的時間是跟我的指導老師張聖琳老師在坪林用茶的復育的方式做地方再造。一般來說，主流傳統上可能是去拿政府的補助或研究經費，用傳統規劃的方式做社區再生，而我們那時候是從產業面著手。那時候張老師跟博士班學生弄了一個藍雀茶，他們新創了一個團隊的品牌，以自然友善環境的農法去做茶。因為坪林那個地方是水庫的集水區，所以如果是用傳統農法的話，不論是對於用水或環境而言都有蠻大影響。所以我們那時候用環境友善的作法，透過新的文創型品牌去復育這個地方。

透過這次經驗，我對於創業以及經營一個小公司就開始有接觸和學習。因為那時候是用公司經營的方式試圖去回應一個地方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在城鄉所比較特別的地方，這樣的操作不是城鄉所外的都市規劃系所會學習到的東西。



▼ 玖樓一隅 供圖 | 潘信榮



二、關於玖樓

Q：學長創辦玖樓的契機是什麼？

A：關於玖樓的想法，是在城鄉所的時候自己想在台大附近租房子然後延伸出想法。畢竟如果不是住宿舍，在台北市要租房子，想要擁有一個舒服的空間、好的室友、好的環境、又負擔得起的房租，在大安區會比較困難。

Q：其他創辦人也是一樣的想法嗎？

A：是，對於學生或者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來講，都希望有一個可負擔，但是環境又不要太差的地方，像住在鳥籠或蝸居的環境。這是大家切身的需求。

Q：您和團隊其他人是如何聚攏到一起的？

A：因為我們在家裡辦各種活動，可能是吃飯，可能是派對，所以它就變成一個認識了非常多人的一個地方。我們最初都是朋友的朋友。大家都發現原來有一個公寓，它讓很多事情可以發生，所以朋友就帶朋友，於是認識越來越多的人。

Q：學長的論文裡提到了網絡崩世代，這和想創辦玖樓有所關聯嗎？

A：我成長在網絡時代，又是在台灣經濟發展的後期，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父母輩已經賺過錢了，但是現在又變成低薪的環境。所以別人說這個時代面對的也是一個高房價、住在城市的負擔、交友的問題。所謂的網絡時代，就是大家已經很習慣在網絡上互動的時候，我們如何創造一個更可以





▲ 信榮近照 供圖 | 潘信榮

讓人與人連接的空間跟環境。我就開始思考從這個角度去看待居住問題，也就是居住空間如何去創造一個可能有更好人際關係的場域，它可以產生出更有價值的事情。

Q：很好奇學長，你覺得你的觀點是更加偏向想要創造強聯繫還是弱聯繫呢？強聯繫像是一種社區型的緊密的關係，弱聯繫比較像是現在年輕人更加喜歡通過網絡，不太喜歡被一個社區的關係所束縛，但還是會和他人有頻率略低的互動的聯繫。

A：我覺得可能偏向弱聯繫，想要透過一個居住的空間或社群去帶起更多弱的連接。因為大家不論是從異地來的，還是他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在地人，他可能都會覺得跟社會或跟很多地方的連接可能是斷裂的。我想藉由這樣空間去創造更多的弱聯繫，但不至於是強聯繫。

Q：也很好奇論文中提到的共生對你來說是重要的嗎？

A：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是重要的，因為如果當初在租房的時候沒有用這樣的概念，它就不會變成一個創業的題目。對於一個學生而言，如何去連接更多的資源？參加社團可能是一個方式，但是對於一個可能時間上更壓縮的研究生而言，除了研究室和回到一個小宿舍之外，有沒有更多的可能？那時候我們把家裡的空間打開來，可以聚會、工作，很多朋友就來來往往，參與了很多學校課堂以外的事情。

Q：總的來說，玖樓對學長的意義是像一個家的地方嗎？

A：我希望把它定義成是一個生活的地方，是以家為出發。家是一天所處時間最久的空間，這樣的空間應該有更多的價值在裡面，我們希望這個家不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我們一開始並不是想創業或想要做什麼很大的事情，其實就是想把身邊人的需求照顧好，幫忙身邊的朋友找房子，做一些簡單的改裝，我們陸陸續續幫身邊的朋友做了蠻多的小公寓出來。加上大概 2015、2016 年的時候，那時候台灣蠻盛行 airbnb 的，所以我們也會把部分的空房間拿出來做短期的出租，也透過這樣的方式也認識了世界各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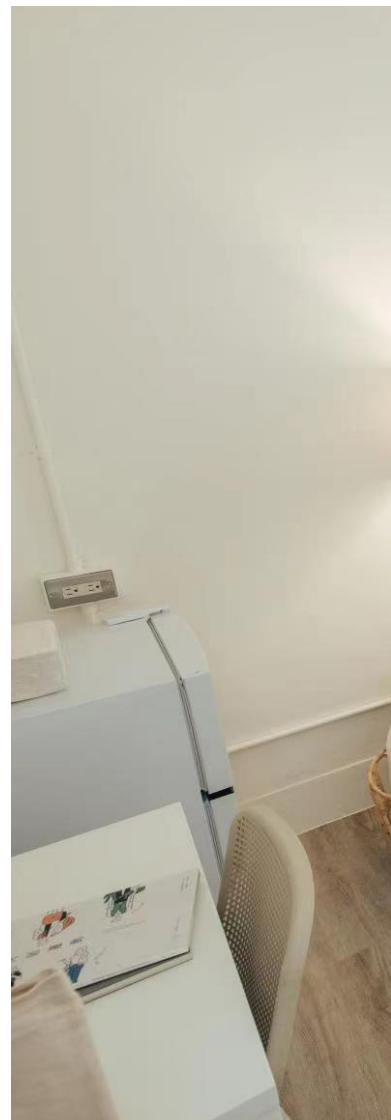
Q：學長對老房子的興趣是從哪裡開始的？

A：我覺得老房子算是一個相對好介入空間的一個管道。回應到台北的狀況，有很多老房子可能沒有被妥善地利用。因為台北也沒有那麼多新的空地讓你可以去蓋一棟大樓，所以老房子在現實層面上是台北的一個可以透過空間手段去介入、回應一些問題的機會。

Q：當你們面對一些批評，例如太商業模式或是租金太高等等這些問題時，通常都是如何去回應這些社會上對你們較負面的評價？

A：第一點是市面上越來越多號稱做共生的事情。我必須說，以我們的定價來講，在有重新翻新過，以及做這樣子的經營，在同業中並不算高。我先區分兩塊，一個是你自己在外租房，這種當然我們一定會略高，因為我們全部重新翻新過，用好的設備等等，建造成本已經比別人高。再來，我們會有其他的服務，像是公共空間是每天有人清潔的，住客不需要因為公共空間的雜亂去跟室友吵架。需要把一些生活和溝通的成本這些考慮進去。

所以我們的定價是反映成本，再來就是市場定價。雖然我們的平均定價可能略高，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配合政府各種政策，無論住客要入戶籍或者是申請政府的租金補貼，我們都會給予協助。



Q：了解到學長是和璞園建設合作，好奇當初是如何和大型建設公司談合作的？城鄉所的訓練有沒有對這件事情有帶來什麼幫助？

城鄉所的訓練有蠻直接的幫助，因為要一直做很多簡報。創業或者是如何說服建設公司，和實習課的評圖相似，要拿一個規劃去說服人，不完全只是空間上操作，可能還會包含財務面或很多其他概念上的事情。在城鄉所，訓練學生要如何服老師、說服台下人、說服評圖老師，都是有幫助的訓練。我鼓勵大家在小組分享或報告盡量積極參與，甚至如果你要一個人報告也很好。

談合作的話，每間建設公司其實都有不同的職業考量，每間公司也會有自己關注的領域。那時候我們把提案發信給很多建商，但幾乎沒有人回覆我們，所以璞園也是一個蠻意外的結果，但除此之外我想說，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想去推動，就真的只能一直去嘗試，因為不知道



▲ 玖樓一隅 供圖 | 潘信榮

誰會買單你的想法。

以結果論來講，有些建商會比較前瞻性地去考慮當土地和房子賣完了，或者房價一直漲，如果要延續下個 20 年，他能不能有其他的商業模式？我從建商的角度看到的是，他們也想要去嘗試未來在少子化、高齡化的情況下，有沒有一種住宅可以以提供服務的方式，而不只是單純把房子賣掉。

三、關於合作住宅

Q：學長怎麼看待合作住宅呢？合作住宅是有公共區域的，不過像比如清潔打掃這些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完成的。

A：我理解，合作住宅可能從他的興建的過程已經有使用者會逐步參與。我認知到所謂合作住宅的一個蠻大核心就是這些住戶會去參與空間生成的過程。在空間引薦的過程，在日常的生活、公共公約，是透過住戶大會或者很多討論去形成。合作住宅更重視在從頭到尾的參與過程。

我不會把我們做的事情跟合作住宅放在一起，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條件跟場域跟背景都是不一樣的。我們稱它為「co-living」，針對現在在都市裡面的工作者如何在這樣的背景、時空條件下，有相對好的生活空間和好的人際關係。

Q：你們是不是給居住者一個比較短期的居住時間？

A：對，像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差異，也是我們比較著重的點，因為我們著重在「都市裡的年輕人」，都市年輕人比較不會在一個地方住 10 年、20 年、30 年。所以我們關注的事情是，回到這個時代，年輕人面對高流動的環境，如何在一個高流動高變動而且多元化的環境裡面有一個相對快速產生認同感跟歸屬感的空間。



四、關於未來的規劃

Q：學長接下來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興趣？

A：總的而言，我們覺得房地產目前還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行業，但不論我們從使用者使用空間的角度來講，還是從行業的規則來講，在這個時代應該有還有很多改變的機會。我在三五年內還是會希望把更友善使用者，或更彈性的住房模式建立起來。

玖樓這個模式有很多人在做。它的其中一個概念就是透過比較小又彈性的個人空間，也透過共享的空間和服務，把生活成本降低、人際網絡打開。在國外或者在中國大陸有非常多的公司做得很好。不過台灣沒什麼人在做，所以我希望能夠把玖樓的模式做到更好。

另外也有很多人想要透過區塊鏈的方式，降低房地產的入手門檻也好和交易的複雜性，讓更多人可以共享房地產利益，或者是透過不同的方式讓房地產在接下來的時間有更多的可能性。

五、對學弟妹說的話

Q：學長有沒有什麼想要對城鄉所的學弟妹們說？

A：我鼓勵大家珍惜實習課的經驗，或者是跟老師各種的計畫的經驗。我覺得各個老師的研究計畫項目是除了課堂之外，可以再多去爭取參與的部分。很多老師的研究跟政府的政策或跟一些產業計畫相關，我覺得對未來工作上生涯有好處。



▲ 玖樓一隅 供圖 | 潘信榮



▲ 玖樓一隅 供圖 | 潘信榮

王昱鈞：

在校園與社會實踐中 重新定義「利己主義」

◎ 訪談整理 林佳蓓

因為是對的人，所以我願意付出

一開始會跟團員一起做音樂我自己也很詫異，因為我沒有那麼喜歡民謠，放送局對我來說是沒有嘗試過的音樂風格。我聽的音樂類型和其他團員不太一樣，所以一開始做音樂都是以其他團員為主，他們想做什麼我就搭配著做。跟團員比較大的不同是，我想要的東西蠻多的，音樂只是我想要的各種東西的其中一部分，剛好又是跟對的人一起做，所以我願意多花一點時間和心力在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我們樂團蠻有機的，大家輪流擔任各種工作。我覺得自己在團體中扮演著像是協調者的角色，因為我們團隊裡面都是一些不聽人話的傢伙（笑），總要有一個比較會社交的人來拉著大家。



從樂團中發現利己主義的價值

每個人對樂團的感受度不同，玩樂團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是人際關係，關係大於各種東西。這也跟我自己的規劃理念有關，有時候在一個團隊裡面或在追求某一件事情的時候，要更多的去想什麼東西對自己有意義、什麼東西對自己好。因此我在放送局跟大家相處的過程中，覺得總要從自己出發，去問自己到底要什麼？樂團有多重性的功能，要思考自己想從這邊拿到什麼。像我在樂團為什麼沒有這麼堅持我的音樂理念，是因為我想要的是大家一起的感覺，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音樂風格上我就可以退讓。我考慮比較多的是大家想要在樂團裡面得到的東西各自是什麼，以及如何讓大家把自己要的東西說出來，是我在樂團中花比較多力氣在做的。台灣人很喜歡強調公共利益，但其實人就是利己的動物，如果每個人都在想對自己有意義的東西時，大家就會在同樣的溝通平面。原因是因為唯有「讓自己快樂」和「感到滿足」是每個人都可以同理的。

我們這四個人的個性差非常多，之所以可以搞樂團是因為我們四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很自我中心，當沒有誰會屈就誰的時候才有磨合的可能性。如果每個人都一直退讓，那這個團體一定不會逐漸在一起。不過我覺得城鄉放送局只是一個結果，我們這四個人是來自一個更大的群體，只是剛好我們這四個人會音樂表演，所以大家比較常看到我們四個。R04 的氛圍並不是因為我們四個人而出現；反之，我們只是 R04 的特殊氛圍下的成果而已，我在 R04 這屆裡面最能體會到的是做為一個規劃師或做為一個知識分子該有什麼態度，我從他們身上學到最有用的就是利己主義。



利己的核心與在社運中的實踐

利己主義聽起來好像只為自己想，但其實不然，我認為是你做的事情只對自己有意義。為什麼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我覺得在城鄉所，大家一直提倡「參與式規劃」，但「參與式」這三個字很容易讓人把自己放到很後面，而讓別人站在前面。這裡面又包含城鄉所左派社會運動者的矛盾，台灣的左派知識分子發跡的過程中有一段時間大家不敢凸顯自己是知識份子，有自貶傾向。但我很疑惑，做為一個知識分子，在社運中的功能不就是指明一條可以行動的方向嗎？不就是因為你存在、你了解，你才有能動性嗎？但如果你的能動性是放棄自己的能動性，那你的存在就毫無意義。我也參與社運很長一段時間，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這件事情。我常跟別人說我參加社運我常常都只考慮我自己，是我願意做這件事情，我在這裡面得到我覺得我想要的好處，所以我才做。

我之所以成為左派運動者是因為我知道我剝削了下面的人，但上面的人也在剝削我，也就是你鬥爭我和我鬥爭上層這兩件事是沒有衝突的，大家都要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但不一定每個人都要成為朋友。在 318 學運時期，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很負面的氛圍中，這個氛圍存在好長一段時間，每個在社運裡的知識分子都把自己放得非常非常低，不敢做決定、不敢提出好的方案、沒有展現出自己學習知識之後該展現出來的樣子，大家都退的很後面，所以就常常發生一件事情——被迫害的受害者最後也得不到知識分子的幫助。

我是一個很懶惰的人，不夠利己我就不會參加運動。我參加運動的原動力來自於我跟我聲援的對象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我在幫



助他們的同時我也在幫助我自己。例如我在幫一個被強拆的屋主爭取土地正義時，我也在反過來爭取自己因為房租太高買不起房子或是開發所帶來的危害和困境。我參加運動是因為我理解這件事情，所以我去做。如果我在這裡面發現了不合乎我自己利益的部分，我就會退場，因為我知道他們已經不需要我，或是我不需要他們了。

▼ 106 學年度台大研究生協會活動 供圖 | 王昱鈞



社運不是運動，而是一種生活形態的表現

我在社運中最大的反思就是不要參加社運，或者說我覺得它不應該成為一個運動。開始接觸左派理論之後，我覺得階級鬥爭不是運動，他是一種生活的表現模式，他是你這個人的生命形態，階級鬥爭要融入自己的生命形態，你要清楚知道自己身在什麼樣的階級、能夠扮演什麼角色、為了讓角色過得更好可以做什麼？而不是有運動我就要參加。我覺得當一件事情必須用運動來展現的時候，很容易落入嘉年華式的集體幻覺。知識分子可以在狂歡會中得到贖罪的快感，而勞工在狂歡裡得到虛假的能動性，然後就結束了。運動過後勞工的階級沒有改變，知識分子也沒有帶來知識分子該有的作為，特別是當代的社會運動常常都落於這樣的窘境。

因此我產生一個新的想法，「鬥爭」是我的生活，我的出發點要是理性的。但很多人都誤會利己主義，認為利己就是自私的，但是社會主義中的完全理性人就是利己主義的存在。我在參加資本論讀書會的時候，我的老師一直提醒我要往本質性去辯證，要弄清楚理論框架的本身，而不是在乎最後的成果或外圍的那些花邊，所以我再重新讀理論時，特別是政治經濟學，他們假設的理性人就是利己主義的，我只想我自己好、你也想你自己好，我們兩個就會達成一種共識，當每個人都想著對自己好的時候，會有一些可以被退讓、被協調的部分，最終達成共識。

很多人都認為「win-win（雙贏）」是因為大家都退讓並限制自己的欲望才得到的，但我認為不是這樣。當每個人都做這件事情，最忠實於自己欲望的人就會成功。解決方法就是思考什麼是對自己最好的事情，所以我反過來參與運動或社會實踐，思考什麼事



情是對我有意義的。舉個例子，我在政治界工作，要推一些法案，那我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撇除各方各派的說法，我回到我自己，我想要法案對哪些人是有好處的，以及我自己要在法案當中扮演什麼角色。當自己知道自己在這裡面扮演什麼角色的時候，反而可以擴大地來想很多事情。當我開始這樣想事情的時候我才發現，其實社會上有很多環節不是我們看不到問題，而是出發點出了毛病。這可能是我在放送局得到最多的，它讓我打開一個新的視角，這個事情反倒不是音樂，而是我跟其他這三個人相處的時候，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校園作為利己主義的實踐場域

我一開始並沒有想要投入學生事務，投入的原因很微妙，上一任會長是昀慶，我在昀慶的研協會沒有擔任太多業務，比較多是在處理行政業務及物資調度，屬於協力者的角色。不過後來因為已經和放送局相處了2年的時間，剛好我對於社會實踐有新的想法，需要一個實驗場域來證明我的方法論是對的，所以才去參選。選上之後就開始在研協會開始新的嘗試，我跟當時招募的第一梯幹部們說，我們研協會要先考慮自己，再來考慮別的事情。

電信所博士班的許瑞福他當時推動「碩博士獎助金計畫」，研協會的幹部都一致認為當研究生的成本太高，剛好我又是一邊上班一邊上課的人，所以我知道大家的痛點。如果有

▼ 昱鈞擔任研協會長期間舉辦研究生運動會 供圖 | 王昱鈞



人可以給我們一筆錢讓我們認真念書、認真為國家產出，研究生為國家知識貢獻勞動力，那當然需要一點回饋。我們是知識生產者，但看看我們的生活，其實我們就只是知識的工作者。所以我們推動研究生應該被視為一種勞動力，那也應該要被支援。我們當時會推動成功的原因是所有人都想要領那筆錢。當我們自己也成為政策的受惠者時，那這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成功的社會運動。為什麼這件事情我要提出來講，因為我從這件事情上看到一條我自己人生的新道路，在這個校園實踐行動裡面我看到的是我的方法論的成果：當所有人在利己的基礎上考慮運動的合理性時，反而可以用最理性的方式去爭取成果，進而對整體社會也是有益的。

城鄉所訓練的方法論是對人的批判

城鄉所最厲害的地方是提供很好的方法論。我覺得城鄉所在方法論的磨練是非常精密的，包含研究方法、行動方法，這是城鄉所的優勢。城鄉所從過去夏老師開始就一直把自己投入社會氛圍上，在城鄉所學到最多的還有批判的精神，那種批判的精神不是對社會的批判，而是顯而易見的對自己的前輩、指導教授的批判，城鄉所的批判已經成為是一種生命形態。這種批判的精神是城鄉所裡很重要的方法論，批判「看不見的群體」很容易，但批判「人」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不過在城鄉所去訓練這件事情，即使是面對自己的指導教授、同學、學長姊，我雖然認識他、了解他，但在這些事情上我就是要跟你爭清楚，這些東西可以帶給城鄉所的

▼ 昱鈞擔任研協會長期間舉辦研究生運動會 供圖 | 王昱鈞



學生在規劃上有明確的方法論。在這個體系之下，當你面對社會上各式各樣的結構性問題時，你不怕去指出結構性的矛盾。如果在城鄉所沒有去磨練批判這件事情我會覺得有點可惜，因為這是很多研究所不曾談過的。那種我為了挑戰、為了鬥爭而去充實我自己，和只跟著老師說什麼就做什麼的學習方式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創業作為個人理論的實踐

我現在是民眾黨的智庫研究員，同時自己開了一間公司做 Vtuber（虛擬偶像技術），算是元宇宙產業鏈的一環，需要動態捕捉、3D 建模這些技術。我一直都是二次元的消費者，我小時候最想做的是漫畫家或小說家，我會開這間公司也是我個人理論的一種實踐。28 歲那年我想了一下，從小到大我有什麼事情是為自己而做的？小時候想當漫畫家，但是社會告訴我漫畫家養不活自己，所以我就很認真工作養活自己；我媽說我沒有正式工作，於是我找了一份正式工作，但這也是別人告訴我的；城鄉所告訴我要社會實踐，於是我當研協會長。想了想我這一生做的事情都是別人告訴我應該要做什麼，那我自己想要做什麼？我心裡的答案是我想要做二次元產業。我看了一下自己的帳戶，好像可以創業，我就創業了。

研究員的工作是研究國家政策，簡單說就是大型規劃師，我們的工作要 24 小時待命，有任何複雜狀況都要馬上處理，因為通常會有蠻臨時的問題，所以主管不會限制上班一定要待在辦公室，也是因為這樣我才有辦法在另外一個地方創業，變成斜槓青年。政治工作者也



是我喜歡的工作，在裡面實踐一些我對於好的社會的想像。

對自己好這件事情不全然是物質性的，有一些是很精神性的，例如我想像中好的社會是長什麼樣子，那我就去實踐它，這正是我現在的工作正在做的，我也是帶著這樣的想法在工作。我會以自己為主，看我自己想做什麼、看我有沒有對理想中的自己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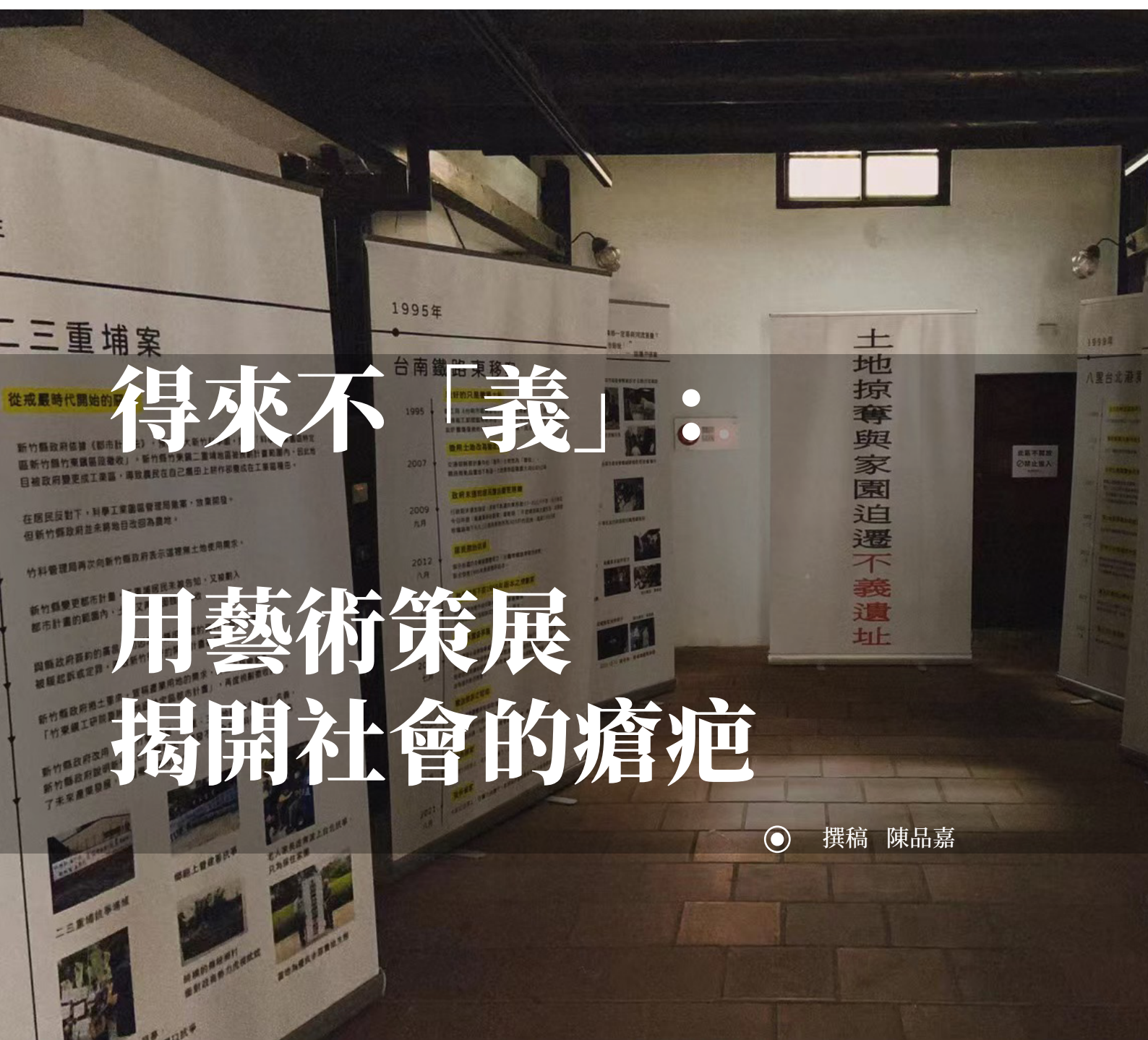
▲城鄉通訊與昱鈞 供圖 | 林佳蓓

更靠近一點。不是每個人都想要成為烈士，大家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想成為的存在。我反過來對於城鄉所教我左派的理論有了新的理解。舉個例子，共產社會為什麼是我想要追求的社會？因為在那個社會裡我可以更有餘力去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事情。所以今天如果革命運動是在這個立場上，我就會去，帶著想法才更可以在這條沒有盡頭的道路上走得更久遠——因為你知道你的標的是什麼，並且清楚知道自己要往那個地方走。

利己主義：做好自己、對自己有利、對自己有意義

去想什麼是對自己最重要的、對自己好的，這件事情比任何事情更重要。不應該有任何事情逼使你退讓自己的利益。你可以妥協但不能退讓，妥協的意思是可

以比較慢達成，但是我始終要達成，或者說我妥協可以讓我自己更快達成，所以我願意妥協。如果如果一開始沒有帶著這樣的心做規劃，城鄉所的方法論是很容易讓人迷失在其中的，會很容易被太多的資訊沖垮，導致沒有辦法好好做出決策，我認為這也是為什麼城鄉所的方法論沒有辦法被好好執行的原因之一。如果把自己放太後面，之後可以做的就只有更退讓自己，最後解決不了問題，只能在被運動傷害後黯然離場。「做好自己」、「對自己有利」、「對自己有意義」永遠去想這三件事情就好，為自己代言。當我為自己想，同時也可以為擁有相同背景、相同階級的人解決問題。只有為自己好這件事情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人不異化的方法就是為自己努力，因為你為自己努力的時候，就不會跟自己努力的東西相矛盾。



得來不「義」： 用藝術策展 揭開社會的瘡疤

◎ 撰稿 陳品嘉

▼行動藝術策展一隅 供圖 | 陳品嘉



資本帶來的好處與利益暈染了當前的社會。在如此渾沌的染缸裡，眾人似乎看不清整體世界的輪廓，反倒開始著重在眼前的自我利益。人本身即有保護自己不受他人侵害之權利，雖然這個概念的誕生與演變至今仍無經歷太多時間，卻深植於每一個民主國家人民的心中。簡單來說，當我們最習以為常的生活軌跡，被他者透過各種手段強力介入且破壞之時，除了毀棄憲法給予人民的基本保障，更是將原本歲月靜好的日子掀起滔天波瀾。由各式土地掠奪行為造成的迫遷事件，激起受難者永無寧日的抵抗行動。

我們時常看到新聞媒體、報章雜誌中，一群因為政府開發行為而被迫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在影像的播送下，警民拉扯、高聲疾呼、跪地痛哭等近乎失去理智的行為，是來自於這些「發展受災戶」的真實感受。雖然這些舉措容易因為藉由媒體的再詮釋而惹來非議，「一定是補償拿的不夠啦，好不要臉喔。」、「這些人真的是貪得無厭，政府都給他們補償了還這樣鬧。」、「你們不要開發，別人需要啊，有沒有考慮過別人的感受，真自私！」，諸如此類的言論對這些民眾來說早已見怪不怪，甚至也不想再多做什麼解釋。

萬幸的是，台灣仍有一群人不斷地在這項議題中努力，期盼透過體制外的力量，試圖撼動牢不可破的社會結構。為了將土地掠奪事件以更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呈現，由政治大學第三部門研究中心於剝皮寮歷史街區舉辦為期 9 天的「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行動藝術展」，藉由展覽敘事及影像再現的策展方式，以無聲的文字與照片，敘述有聲的反對與抵抗。

這場展覽，源自於政府的公開說謊

「我們辦這場展覽其實很倉促，目的是為了回應政府在今年五月說的話。」政大地政系徐世榮教授說。徐教授接著說：「在五月的時候，台灣進行兩人權公約的會議，其中內政部長居然在公開場合表示，台灣完全沒有迫遷案，政府都有跟民眾保持良好的對話空間。至於為何民眾申請行政訴訟都以敗訴收場，是因為政府的行政程序嚴謹，這些話令在場的許多自救會夥伴，包含我在內都大為震驚。」基於這段不是事實的陳述，促成這次藝術策展的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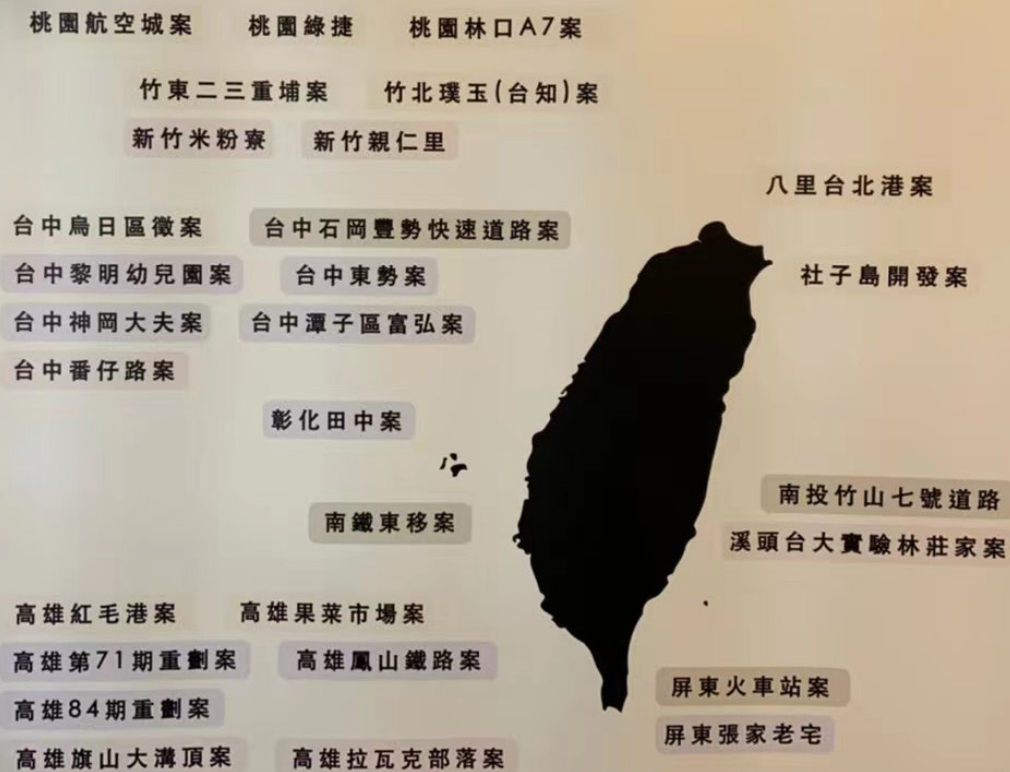
不知是否是有意選址，或者是一種因緣巧合，策展地點選在同有經迫遷事件的剝皮寮，

▼曾有人居的剝皮寮如今成為歷史保存街區 供圖 | 陳品嘉



在早已人去樓空的房舍裡陳列一張張黑白照片，令人感到格外的諷刺。策展中的所有影像，皆有賴台灣土地正義行動聯盟成員的協助，在全台各地進行迫遷者的串聯，勇敢的藉由疲憊不堪的身軀，以及腳下或身後危殆且殘破的家園，靜默地闡述曾經遭遇之不義過往。照片中，迫遷者們扶著印有「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不義遺（場）址」字樣的白色看板，雖然只是以二維的圖像呈現，卻能在久久凝視之後，感受到發展掠奪之後遺留的傷痛，以及一些無法回頭細品的美好時光。迫遷者們沉痛的眼神，無疑是對於政府「合情合理」論述的質疑與反制。

▼策展團隊整理的全台土地掠奪事件 供圖 | 陳品嘉



公共利益光環下的不義之財

隨著社會的變遷，社會資源在人口不斷的成长與需求之下趨於稀少，這就衍伸了該如何在資源稀缺的年代，以最簡便且快速的方法獲取高額的利潤，進而推動自我利益的增長，並以此推動下（再）一次資本滾動的可能。土地的特性使其成為恆常不變的投資標的，擁有永久性、固定性、折舊率低等特質，使得無處安放的資本，找到最佳「安身立命」的所在。

資本家看準這點，是因為土地具有市場利益，具有轉化為資本的潛力。那麼，對於政府而言，土地具有何種意義？政府會如何使（利）用土地呢？以過往的經驗來看，政府與資本家最大的差異，即是前者擁有策動並行使公權力之能力，換句話說，政府能以公共之名恣意妄為，自詡為社會大眾的代言者，有意無意的欺瞞缺乏相關知識的平民百姓。打著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大旗，實則是謀取個人或特定團體的私益，何來公共之有？這些公共難道是要通過地方居民的犧牲來達成嗎？常說的「相忍為國」，但「國」，何時曾想到你 / 妳了？

雖然這些痛的記憶與經驗，唯有發生在自己身上才能浮現同等之感，但我們不妨靜心反思，當人們與土地連結的根系被連根拔起，人要如何才能找回我們曾經賴以維生的故土，人若無土地的孕育與滋養，游移於社會如同失根的浮萍，心靈頓時無寄託之處，試問，這真的是執行公共利益之後樂見的結果嗎？或許，在這個行動藝術展中，可以找到自己認定的解答。



▼來參與活動的迫遷戶背影 供圖 | 陳品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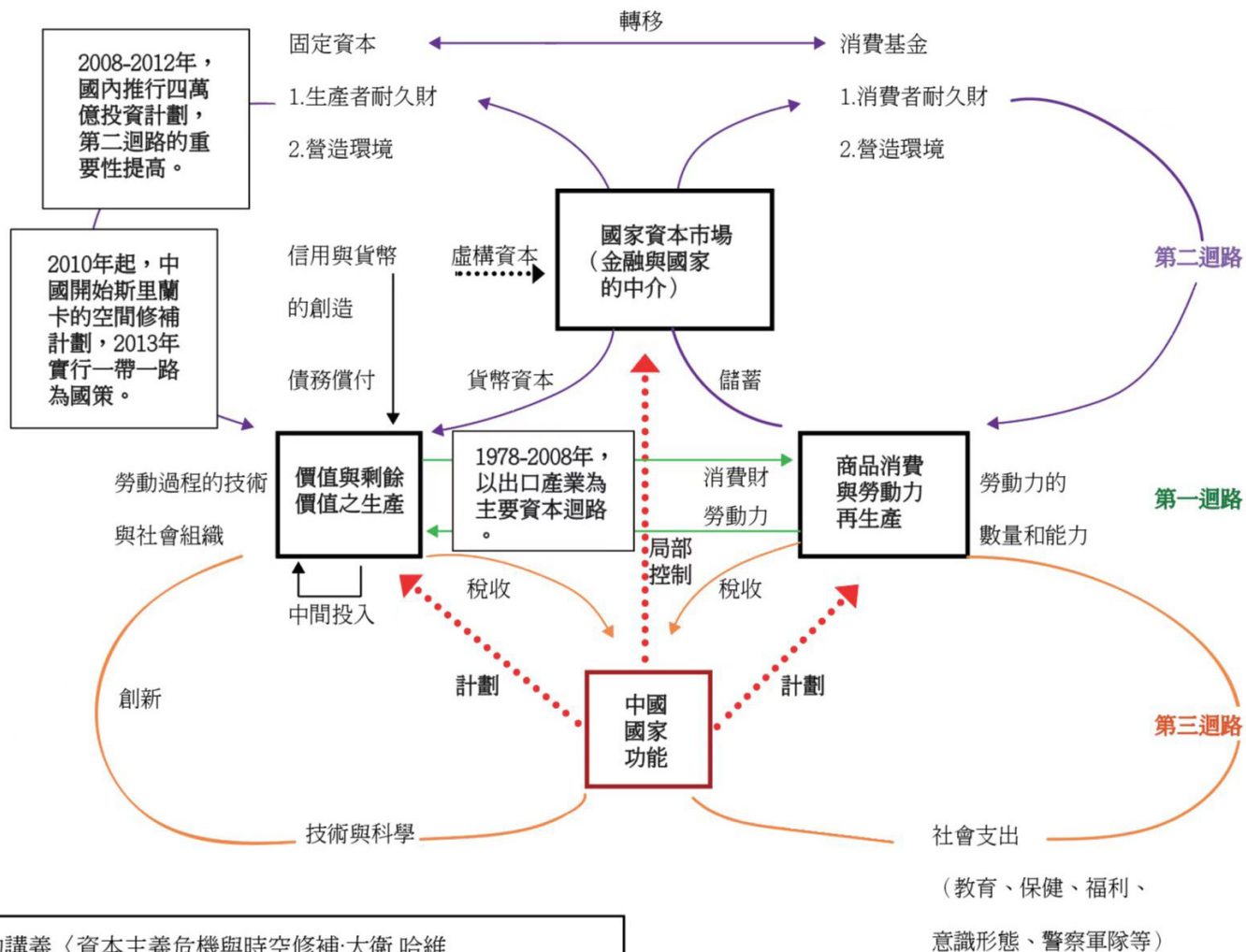
全球化下中國空間修補方式的轉變——

中國與斯里蘭卡經驗

◎ 撰稿 鍾智豪

一、空間修補是資本擴張地理的必經階段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認為資本主義擴張的手段是以時間消滅空間，他討論資本主義無意打開了資本、空間相連結的辯證方式（Harvey, 2010）。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嘗試為馬克思作註釋，認為地理學意義的全球化下的空間和資本是相互反映，資本主義擴張必定會改變該區域的經濟結構，故此哈維建構了空間修補（the spatial fix）這個概念，意指本地資本於當地重構空間，實行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或跨國資本固定另一個區域發展，同時亦隱喻資本猶如吸毒者，資本流入該區域只能暫時止癮，全球化下資本滅亡之前擴張永無終結（Harvey, 2010）。和哈維引用的西方經驗不同，中國的國家權力伸延至市場，並能計劃剩餘價值之生產和勞動力再生產的方針，簡言之，國家可以控制資本流動路徑達到自身目的（見圖 1）。



製圖根據王志弘的講義〈資本主義危機與時空修補:大衛.哈維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Fix: David Harvey〉(頁527)的「圖1 資本流動的路徑(Harvey, 1985b: 9)」(中文版)為基礎，再根據現實中國的資本流動路徑，加以修改。

▲中國的資本流動路徑 供圖 | 鍾智豪

二、中國國內的空間修補

(一) 現代中國的誕生

國共內戰之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蘇聯的指導下實行計畫經濟，逐步消滅私有制，期望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富國強兵（馮客，2016）。但隨著冷戰中蘇關係交惡後失去技術支援、只好嘗試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式的發展，但當中浪費了許多資源，生產力亦沒有顯注提高。隨後文化大革命來臨，政治鬥爭使生產環境更為惡化，強國之路幾乎停滯。六、

七十年代中國經濟和城鎮化緩慢發展，亦因為施政失誤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馮客，2016）。

隨著 1972 年中美關係改善，開始融入國際社會；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開啟局部國內市場和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國內出口產業做好準備，這種情況才有所改善，亦開啟了中國國內空間修補和原始累積

（二）中國高速城市化和其空間修補的飽和

1978-2008 年這三十多年是中國國家市場經濟的成長期，中國政府聲稱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恢復了私有產權、國家主導市場開放、鼓吹發展建設）帶來的經濟成就，隨著國內空間修補—大型基建和房地產，中國城鎮化於 2011 已經超過五成（中國新聞網，2012），同年城鎮人口超過國民的一半人口（國家統計局，2019），在 2011 年到 2013 消耗水泥 65 億 5100 萬噸，超過了美國上世紀一百年的消耗量（林品，2016）。

同時中國城市化亦生產了多處空城—包括很多賣不出去的房地產，使得基建形同虛設；《中國：潰而不崩》提到，2009 年後中國的出口產業隨著全球經濟衰退而減少收益，2015 年，國內八大的殭屍企業其中三個就是鋼鐵、水泥、玻璃，都是建材行業（何清漣、程曉農，2017），反映到中國公部門和私部門的空間修補有飽和跡像。

由此可見，中國資本流動的路徑在 1978-2008 年以第一迴路為主，以國內勞動力交換國外的消費財，國家和資本家以剩餘價值再生產更多的商品內銷和外銷，這時，資本的第二迴路為輔助，營造方便生活和出口產業的環境；可是，2007-08 年，環球金融危機打擊中國的出口產業，然後中國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這標示著中國開始轉為第二迴路的修補，以生產耐久財（基建、房地產）為主。

2008-2012 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因應前一年環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決定於國內推行了四萬億投資計劃，當中有許多空間修補的措施—增建安居工程、廉租房、農村基礎設施、完善高速公路網、校舍改造、生態環境建設等等（新華網，2008），中國嘗試以國內空間大修補去彌補出口產業衰退帶來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但該投資計劃帶來了問題：中國忽視了生產和需求的關係，變成為生產而生產的空間修補，計劃帶來的通貨膨脹亦加劇了經濟不均。

2021 年，中國的空城的單位數量足夠整個德國人口居住（馮茵，2021），中國國內的空間修補已到極限。

（三）中國國進民退的隱憂

和大衛·哈維設想的資本路徑不同，中國對於市場、企業和勞動力有一定的掌握力。國進民退反映了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衰退，也是國家掌控資本的過程。自千禧年，中國政府會透過立法控制重要的產權，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去獲得資本和掌控生產資料，有利國家政策的推行（夏樂生，2007）。同時，中國政府的企業稅收七成來自於國企，但亦考慮到民企自發的商業活動能更有效率為政府增加收益，故在考慮國策時，對民企和資本市場應否「進」經常搖擺不定。但在隨後2013年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國企的角色和產業卻顯得很重要。

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擴張前期的特徵是產能過剩、不自然生產，國家意識形態變得具有侵略性，中國由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轉型為擴張型國家。胡溫治下前兩者已經出現，至於後兩者於習近平時期已經成型。

▼三個時期中國形態的空間修補方式 供表 | 鍾智豪

中國	1949-1977	1978-2012	2013-
資本	缺乏	足夠	過剩
社會關係	沒有消費 只有生產	生產對應需求和 消費	不停生產是為了 保找資本的價值 生產不一定和需 求有關係
空間修補	緩慢的城鎮化	高速城鎮化 促進經濟增長的 十項措施（四萬 億投資計劃） 國內基建過剩 房地產過剩	提供借貸投資於 發展中國家興建 基建和運輸工具 有意建立軍事基 地
國家形態	社會主義國家	官僚資本主義國 家	官僚資本主義國 家（擴張型）

三、中國對斯里蘭卡的空間修補

（一）中國擴張式的空間修補

中國對非洲經營了數十年，累積了國外空間修補的經驗，然後 2013 年提倡一帶一路，到目前為止中國於東亞、東南亞、西亞、歐洲、非洲和南美洲已投資了七十個國家，2014-17 年間一帶一路的投資額已達到 8,270 億美元（朴之水，2020），可以預見一場全球性的空間修補已經開始。可是全球化下，各國和各區域的環境、政經和社會關係都各有不同，中國模式（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空間修補是否對該國的發展有利？如果向中國借貸投資後失利，又會承受什麼後果？中國於斯里蘭卡進行的空間修補也許可以解答到以上問題。

（二）中國空間修補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位卡印度洋，是印度南方的海島之國，亦是一個生產經濟作物的國家，戰後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成為獨立國家。但好景不常，斯里蘭卡在八十年代發生了長達二十年的族群內戰（Abi-Habib, 2018），戰後時任總統馬顯達·拉賈帕沙（Mahinda Rajapaksa）打算重建經濟（國內還有貿易順差的問題），故此向邦交國中國求助。而中國存在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正在推行一帶一路實現資本擴張和空間修補去解決資本、產品、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故此願意借貸和投資斯里蘭卡，但是當中洽談過程不透明，國際社會無從得知兩國是如何協商的。

中國為了解決資本、產品、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其空間修補主要以現代化大型運輸基建為主。2010 年起，中國興建斯里蘭卡第二個港口、完整公路網絡、地下道、第二個國際機場、鐵路和大型板球場於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但當中公路、板球場和國際機場的使用率不高，而機場更只有一條國內航線和淪為觀光景點（0.57 美金為入場費用），公路上車輛不多，有不同的野生動物走過（威傑達沙，2019）。斯里蘭卡在兩期基建共借了 11 億美元，打算透過興建基建改善運輸、生活和增加工作機會，但是最後斯里蘭卡只有增加了國債，這些中國基建並沒有發展當地經濟，規劃的錯失亦影響了當地人民的生活環境。

（三）中國的經濟、軍事雙重殖民？

中國於斯里蘭卡的投資過程並不透明，已經受到不同學者和當地官員的非議，認為這樣做會損害到當地人民的利益，例如以經濟作物為主的斯里蘭卡，沒有需要興建多一個國際機場和第二個港口。雖然當地人民一開始亦支持以中國資本振興當地經濟，但後來就意識到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一來中國政府只會聘請中國工人在斯里蘭卡興建基建，當地人民沒有就業和學習技術的機會，亦無法改善生活，二來中國資本的擴張造成了斯里蘭卡的原始積累，使當地人民失去了土地、工作和居所，被逼到郊外與大象為鄰，人和動物之間偶有衝突，生活素質愈來愈差（威傑達沙，2019）。

雖然斯里蘭卡有完整公路網絡，但興建後的 18 年間要交由中國企業管理回本，故此斯里蘭卡政府要負上巨債（邱立玲，2021），同時亦沒有權利從當地的基建獲取收益去還債，中國的空間修補模式具有侵略性，會以他國的資本、土地和資源彌補產能過剩，斯里蘭卡實際需求並不重要，該國最終沒有能力還債（已累積了 30 億美元債務）就以當地土地資源去還債（威傑達沙，2019）。最終，斯里蘭卡將漢班托塔港和周邊 1.5 萬英畝土地以 99 年為期租給中國（威傑達沙，2019）。中國以債務式的空間修補作為手段控制該國運輸工具，實現自建自用，為的是將資本擴張的下一步鋪路。

除了發展轉口港作為一帶一路經濟戰略，中國還被懷疑駐軍港口，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到訪斯里蘭卡，見到一架中國的宋級攻擊潛艇停駐在可倫坡港口，這事件引起日、美、澳和印四國的憂慮，他們擔心中國會於斯里蘭卡設立軍事基地（威傑達沙，2019），亦懼怕中國的資本擴張有轉為軍事擴張的可能，亞洲的地緣政治漸漸被中國債務式的空間修補改變了。面對這個區域格局的改變，當地人民竭力抗爭只能暫緩徵收土地，更遑論改變這幾近已成定局的空間修補。

四、中國式空間修補下的資本迴路死結

中國式空間修補最大的問題是其貸款沒有進入斯里蘭卡的資本路徑裡，一般來說，外國貸款進入本國資本路徑，由本國決定規劃、聘請專業人士、購買建材，更重要的是這能提供本國勞動人口就業機會，然後勞動人口生產基建（耐久財），一來生產者能學習生產技術（技術與科技）、儲蓄（重新投放入市場），這有利活動資本路徑的第二迴路，二來，國家可從第三迴路收稅，把稅收再用以提升產業的技術與科技和社會支出，從而提升市民的生活素質，然後國家透過基建收益和逐步增加的稅收去還債。但現實情況是，斯里蘭卡付款買非剛性需求的基建，但同時要把其交給中國經營 18 年還債。事實上，斯里蘭卡人在該計劃下沒有工作機會，亦因此被迫遷，沒錢或不常使用中國基建。現在斯里蘭卡已經割地和破產，而中國亦未必能收回債款，這種空間修補不僅未能互惠互利，還造成了雙方的損失。

五、總結

中國空間修補的三個階段指出了中國如何從資本路徑塑造今日的國家形態，文中亦提到中國從 1978 年之前缺少資本和城市化緩慢、到改革開放後依靠累積資本、高速城市化和對外擴張空間修補。

中國面對資本剩餘於國內空間修補實驗四萬億投資計劃，造成社會的貧富不均後，轉為將資本、產能和勞動力過剩帶到斯里蘭卡進行空間修補。這個空間修補的過程沒有照顧當地的勞動人口和剛性需求，最後為當地人民帶來了原始積累和經濟衰落的苦難，還有中國潛艇顯露了的其可能潛在的軍事意圖，印度洋的地緣政治亦因此開始緊張。假使如大衛·哈維所言資本主義下空間修補不斷延伸直至盡頭，最終資本只能自我消滅，但隨著中國將資本擴張至全世界，斯里蘭卡的空間修補經驗也許會成為全球化下我們的生活日常。

參考文獻

中國新聞網（2012）〈中科院報告：中國內地城市化率已突破 50%〉，中國新聞網，檢自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2/10-31/4290659.shtml>。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何清漣、程曉農（2017）《中國：潰而不崩》，新北市：八旗文化。

國家統計局 (2019) 〈人口數，城鎮人口和鄉村人口〉，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檢自 <http://www.gov.cn/shuju/hgjyxqk/xiangqing/np.html>。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夏樂生 (2007) 〈從「國退民進」及「國進民退」現象看大陸民營企業之發展〉，《展望與探索》(pp. 18-47)，新北市：法務部調查局。

威傑達沙，納米妮 (2019) 〈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沒船的港、迫遷的人，以及「還沒發生」的自貿區〉，端傳媒，檢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430-international-hambantota/>。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新華網 (2008) 〈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 確定擴大內需十項措施〉，檢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112073531/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1/09/content_10331258_1.htm。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朴之水 (2020) 〈哪些國家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中獲益最多？〉，香港貿發局，檢自 <https://beltandroad.hktdc.com/tc/insights/which-countries-have-benefited-mos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林品 (2016) 〈哈維中國演講 I：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端傳媒，檢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3-opinion-david-harvey-china/>。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王志弘 (n.d) 《資本主義危機與時空修補：大衛·哈維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Fix: David Harvey》(頁 527)。

邱立玲 (2021) 〈中企拿下斯里蘭卡首都公路 18 年經營權 再次引起當地人「被中國殖民」擔憂〉，信傳媒，檢自 <https://tw.stock.yahoo.com/news/%E4%B8%AD%E4%BC%81%E6%8B%BF%E4%B8%8B%E6%96%AF%E9%87%8C%E8%98%AD%E5%8D%A1%E9%A6%96%E9%83%BD%E5%85%AC%E8%B7%AF18%E5%B9%B4%E7%B6%93%E7%87%9F%E6%AC%8A-%E5%86%8D%E6%AC%A1%E5%BC%95%E8%B5%B7%E7%95%B6%E5%9C%B0%E4%BA%BA-%E8%A2%AB%E4%B8%AD%E5%9C%8B%E6%AE%96%E6%B0%91-%E6%93%94%E6%86%82-232835160.html>。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馮客 (2016) 《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頁 72-299)，新北市：INK 印刷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馮茵 (2021) 〈中國賣不出去的「鬼城」數量龐大 CNN：幾乎可容納全部德國國民〉，Newtalk 新聞，檢自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10-15/651632>。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Abi-Habib, Maria (2018) 〈中國如何令斯里蘭卡將漢班托塔港拱手相讓〉，The New York Times，檢自 <https://www.nytimes.com/2018/06/26/world/asia/china-sri-lanka-port-hant.html>。閱讀日期：2022 年 4 月 18 日。

Harvey, David (2010) 〈空間修補：黑格爾、邱念與馬克思〉，《資本的空間》(王志弘、王珣民譯) (pp. 415-456)，台北：群學。